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目 录

前言.....	(1)
愤怒的控诉	
——退休码头工人钟友家史.....	(8)
血海深仇	
——搬运女工蔡来春血泪家史.....	(23)
两个时代两个天	
——退休码头工人郑尚贵家史.....	(42)
鹭江码头“散工”恨	
——退休码头工人廖菊家史.....	(58)
历尽风霜志不屈	
——退休码头工人白文家史.....	(72)
刘师傅年夜忆苦	
——码头工人刘立镜家史.....	(84)
不忘阶级苦 红心永向党	
——退休码头工人蔡洪家史.....	(95)

前 言

不知道旧社会的苦，就不会懂得新社会的甜。在社会主义的红旗成长的青年同志们！你们知道在旧社会里，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广大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请读一读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几位厦门码头工人的苦难家史吧！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要反帝反修，为什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解放前的黑暗岁月里，豺狼当道，群魔乱舞，厦门港码头是帝国主义分子、反动派、资本家、封建把头们的“乐园”。滔滔的鹭江波涛，流不尽中国人民的辛酸血泪；茫茫的厦鼓海空，装不下码头工人的深仇大恨！

自从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厦门就被划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到反动透顶的蒋介石王朝，这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都把厦门港的各种主权双手拱奉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不仅控制了厦门海关，取得了领事裁判权、驻扎军队权，还划租界，开商行，建码头……。英帝国主义于一八八〇年就在厦门建起了太古码头，其他帝国主义也先后把魔爪伸进厦门港各个码头。厦门港码头成了帝国主义者侵略和

掠夺我国人民的一块跳板，成了它们插在我国劳动人民身上的一根吸血管。

历尽风霜的厦门港码头工人，是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历史见证人。是他们，亲眼看见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情景：帝国主义军舰上荷枪实弹的水兵从码头冲上岸来，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牧师、传教士之流，从码头爬上岸来，阴险恶毒地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帝国主义资本家从码头上走私贩毒，运进了毒害和麻醉中国人民的鸦片，倾销其“过剩”物资，又从我国掠走了大批的金银珠宝和各种农产品、矿物资源；帝国主义人贩子把从各地拐骗来的成千上万中国劳苦大众带上镣铐锁链，从码头上拖进轮船的底舱，作为“猪仔”卖到外国当苦力。……帝国主义强盗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为了加强对厦门码头的控制，更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码头工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政府、封建把头互相勾结，豢养了洋奴买办、工头等，作为自己的爪牙。这些工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在码头上的代理人，他们依恃权势，霸占码头，按同姓家族组织诸如“家族自治会”这样的封建行会和帮派，作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把头联合统治码头的工具。在这种封建家长制的法西斯统治下，厦门码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统治码头的反动家伙们根本不把码头工人当人看待，而把工人称做“苦力”、“乌鬼”、“人工”。他们强迫同姓家族的工人加入“家族自治会”，并交纳高达工资百分之三

十的“会费”，否则就不能在码头做工；非同姓家族的工人只能做“散工”，却同样要缴纳“会费”，并受“家族自治会”大小工头的统治。“家族自治会”还规定工人不许怠工、罢工，而且私设牢房，滥用刑罚，可以任意关押吊打直至开除码头工人。码头工人被剥夺了一切最起码的权利！

码头工人在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劳动强度也是罕见的，但工钱却低得惊人。拿工作比较稳定的同姓家族工人来说，每天的工钱名义上有六七斤大米，实际上扣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费”，诸如家族自治会费、码头管理费、黄色工会费、码头修理费、工具费、茶水费、出栈费、人头费、号帽费，以至吃空额费等等，拿到的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三。就这么几个工钱，大小工头还不肯放过，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种种鬼花招，巧取豪夺。比如，他们把工钱按高价折成实物发给码头工人，而工人拿到这点实物又不许拿回家，必须拿到他们开设的“海鸡母店”去变卖。那“海鸡母店”用压价、克扣秤头等手段又抢走这些工钱中的十分之三四。又如拖发工钱，他们利用反动政府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把码头工人的血汗钱拿去套购美钞黄金，搞投机，放高利贷，等到货币贬值了再发工钱；码头工人流尽血汗，往往只能领到一迭跟废纸差不多的伪币。多少工人被这些毒辣的手段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这些嗜血成性的贼工头比虎豹豺狼还凶狠万倍啊！

在这样残酷的压榨下，码头工人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挣扎着。他们吃的是米糠、野菜、烂菜头，住的是“日出疏窗影，雨来叮当声”的破草房。许多单身工人更是流落街头巷尾，露宿风餐。今天海后路后面的一条街，过去叫番仔街，就在番仔街原太古公司仓库房外楼梯下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过道，当年每天夜里挤住着四十多个无家可归的码头工人。这哪里是住所，简直是囚笼。酷暑、严寒、饥饿、疾病，象魔鬼一样吞噬着码头工人的生命。厦门沦陷期间一次鼠疫流行，住在番仔街的码头工人，一下子就死了二十多人，令人惨不忍睹！苦难，贫困，使累弯了腰骨的码头工人大约有一年过四十还成不了家。多少人由于年老残疾，孤苦伶仃，葬身在垃圾堆旁！而码头的反动统治者们却在工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建起了罪恶的“天堂”，过着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这些家伙还搬出孔孟“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谬论来欺骗和麻痹工人，为自己的罪恶辩护，真是反动透顶，卑劣到了极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跟全体中国工人阶级一样，厦门港码头工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向旧世界宣战，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和光荣历史。

早在一八五二年，厦门码头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的“卖人行”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给帝国主义殖民者的野蛮行径以严重警告，严惩帝国主义的

人贩子和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军的一支队伍在厦门登陆，码头工人和广大穷苦百姓，迎接了起义军的队伍，并同他们一起战斗。一八九九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割虎头山一带为租界，码头工人和广大人民义愤填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提出了“保全国土，勿媚外人”的战斗口号，用棍棒、石块狠揍了日本强盗，吓得日本鬼子如丧家之犬。一九一八年，英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海后滩为“租界”，码头工人无比愤慨，首先起来罢工，并同厦门各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提出了“驱逐英国番仔”“收还租界”等口号。这个斗争得到福州、上海等地工人的声援，一直坚持了十多年之久，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全部归还海后滩租界。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厦门码头工人联合广大群众，举行示威，抵制日货，拒用日币，不给日轮起卸，集会抗议日本强盗的罪行，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厦门码头工人同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工头、资本家进行了一系列英勇的斗争。解放前夕，码头工人还展开了“反劫运，反破坏”的斗争，保护码头、仓库设施，阻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运输，打乱了他们的逃窜计划，挫败了他们破坏码头的罪恶阴谋，用战斗迎接翻身解放日子的到来！

红旗指处乌云散，鹭江码头换新颜。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四九年十月，厦门解放了，厦门港码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码头工人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搬运公司从小队、中队到公司一级的领导成员中，有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是码头工人。许多码头工人还被选为人民代表，被提拔到市、局党政工团的领导岗位上来。解放以来，已有四位码头工人先后光荣地上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厦门码头工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在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集体智慧。

码头工人在生活上也大翻身。解放后厦门码头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解放前高七八倍，而且彻底铲除了种种敲诈勒索；码头工人还享受国家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等待遇。党和国家还为码头工人建新村，办工人疗养所……。码头工人无限感慨地说：“过去码头工人是甘蔗取中节；年青当牛马，年老疾病踢一旁，抛尸荒野无人收。如今是生老病死有依靠，一代更比一代强！”

人变地变码头也在变。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后的码头工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立足海港，放眼世界。他们自力更生创大业；用自己的双手，大搞技术革新，制造了各种吊车、升降机、输送机、牵引机等机械。一九五七年鹰厦铁路铺轨到码头，整个码头实现了水陆联运，装卸机械化程度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部分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码头工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充分发扬了主人翁的精神，大干快上，生产飞速发展。仅和平码头，现在一个月的货物吞吐量就比解放前太古码头一年的吞吐量还要多得多！这一切

都生动地体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真理，是对从孔老二到林彪的一切反动派所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的最有力回击！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厦门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师生，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和“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教导，深入厦门港码头，向工人学习，同工人一起，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并同他们一起，把码头工人的回忆对比材料加以整理。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厦门市委宣传组的指导下，编成这本书。选进这本书的七篇家史，记录了厦门码头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的几个侧面。希望它们能够帮助青年同志们不忘昔日苦，牢记阶级仇和民族恨，从而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更坚定地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永远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

愤怒的控诉

——退休码头工人钟友家史

在旧社会，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压迫，我在厦门码头上流尽血汗，还被迫流浪到海外去卖苦力，可是一件破棉袄穿了二十多年，四十多岁了还不能结婚成家。多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我们工人才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然而，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妄图从我们工人阶级手里把权篡夺过去，复辟资本主义，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工头卷土重来，把我们重新推到旧社会的苦难深渊中去。我们坚决不答应！我要用我解放前几十年的苦难经历，愤怒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痛斥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一、父死母卖 流落厦门

我的祖家在厦门郊区钟宅村。父亲是雇农，常年给地主

做短工。为了维持一家生活，他专拣重活干。可我们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只好吞糠咽野菜。父亲由于长期劳累和饥饿，在我十岁那年（一九一二年）终于一病不起。狠心的地主、富户们见我们穷，连治病的钱也不肯借。看着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母亲的眼泪也哭干了。过了没多久，才三十多岁的父亲就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抛下母亲和我，寡妇孤儿，相依为命。

可是，这样的苦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母亲又被同族中掌权势的人卖掉了。那时我还小，呼天抢地哭着到处去找母亲。但在旧社会，天暝暝、地昏昏，我这个苦孩子的满腔仇恨向谁去诉说呢？我只好替人家放放牛，做些杂工，挣扎着过日子。

有个经常到钟宅挑糠的大个子福哥，十分同情我这个孤儿，一直很关心我。我十四岁的时候，他出主意叫我去厦门去闯一闯，并给了我五十个铜板作路费及其它杂用。我按照他的指点，跟着一群挑糠的工人，从江头坐船到新填地上岸。

一上岸就是大王宫。初到一个陌生地方，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天黑了，我见许多穷人都挤在大王宫戏台下睡觉，也就钻到戏台下，找了一个角落躺下。

一连几天没有工作，五十个铜板也用完了。这时，有个饭馆的老板想找个洗碗筷的伙计，大伙儿就指着我说：“这个孩子刚来，没有活干，就叫他干吧。”可是，有个不三不四的人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什么我的来历不明，那老板一听

就不要我了。后来，附近一个摆冬粉摊的掌柜要我帮他做杂工，我才能吃到一些残汤剩饭。

有一个码头老工人李大叔，经常来这个冬粉摊吃冬粉。他了解我的身世后，十分诚挚地要带我到码头上去找工做。我就跟他上了码头。

李大叔是在船上操作吊杆的。他把我带到太古埕，让我跟他一起上船。李大叔叫我在舱底用钩子钩住货物，他把货物吊上去。他还教给我一些操作吊杆的技术。操作吊杆的是两个人，我在那里帮忙，李大叔就把他俩的饭匀出一分来给我吃。他们这样照顾我，使我深深地感到阶级情谊的温暖。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知道，李大叔正患着病，而我却老是分吃他们的饭，长此下去是不行的，于是我决心自己独立在码头上找活干。

那时候，厦门码头被陈、吴、纪三姓宗族的封建把头控制着。象我们这样杂姓的外地人，在码头上没有固定的立脚之地，只能当散工，临时在这里做做，那里帮帮。码头工人在旧社会被那些地主资本家和有钱有势的人轻蔑地称为“苦力”，我们做散工的比一般“苦力”更苦，被叫做“乌鬼”。码头上都是拚死力气的重活，通常一箱货都在二百斤左右，扛一箱货只能拿到一个铜板的工钱。我年纪小，身体弱，扛不动这么重的货，常常是一个铜板也挣不到。老工人们都很照顾我，有时分一点饭给我吃，有时送我一些碎米。我挣不到工钱的时候，只好跑到内地来的客船上向人们讨一些残羹剩饭，或者跑到提督路头拣人家扔掉的烂果子，用海水洗一

洗充饥；有时候，我到衫行街去，碰上人家办红白喜事就帮着扛彩旗，挣几个辛苦钱度日。

到了十六、七岁，我才勉强扛得动二百斤重的货物。我的肩膀压肿了，本来又破又烂的衣服磨得不成块了，可是，我的工钱有时连吃饭还不够，哪里有钱去买衣服穿呢？我只好去拣人家扔掉的破衣服、破麻袋片和烂草席子。有人告诉我：“这些破烂是包裹过死人的。”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没有这些破烂东西，我就无法在船头行的楼梯脚下或马路边睡觉，更无法度过寒冷的冬天。我这个码头工人，和乞丐又有多少差别呢？

二、五块叻币 一年冤狱

在旧社会，我们码头工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最残酷的剥削，而且处处受到歧视和压迫，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更不要说政治地位了。在码头上摇来晃去的一批国民党水警，整天狗眼盯着我们，只要不顺他们的心，非打即骂，祸事随时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一天，从新加坡来了一艘轮船。我帮旅客们搬完行李，就在船上废物堆里挑拣一些旅客们扔掉的破罐头、烂纸片等。正挑着，忽然看见一张花纸票，我因为从来没见过，觉得很新奇，就拿在手上反复看。问问和我一起拣破烂的几个人，他们也不认得。突然，一只手钳住了我的肩膀，我使劲站了起来，一看，两个凶神恶煞似的水警正站在我的身后。

一个翘嘴唇的瘦高个儿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问，

“你把旅客的旅行包偷到哪儿去了？”

“什么旅行包？我不知道啊！”

话音未落，另外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一把将我手里的花纸票抢了去，还瞪着一对死鱼眼睛冲着我吼道：

“没有偷，这是什么？”

“这是从这个破烂堆里翻出来的，我也不认得是什么东西。”

那个翘嘴唇的逼上来说：

“还嘴硬，这就是你偷来的钱！”说着，就左右开弓打了我两记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张花纸票是一张五块钱的新加坡叻币。这帮狗警察见钱就眼红，所以捏造罪名，对我进行诬陷，乘机从我手中抢去那张纸票。

当时，在旁边的穷兄弟们都愤愤不平，一齐围上来说：

“这张纸票确实是他从破烂堆里拣出来的，刚才还给我们看过呢！”两个家伙操起警棍把大家驱散，一面不干不净地骂道：“干你们的屁事，谁要多嘴，上警察局去！”

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又在我身上搜来摸去。我忍不住问他们：“旅行包也不能放在身上衣袋里，你们在我衣袋里摸什么？”一句话戳到了他们的痛处，那翘嘴唇又搨了我两记耳光，一面破口大骂：“他妈的，就是要搜你，你要怎么样？”这两个家伙把我全身搜了个遍，搜出了我十多天来辛辛苦苦积攒的一元多血汗钱，就往自己腰包里塞。

我气得冲上去跟他们评理：“这是我每天做工得来的钱，凭什么你们要拿走？”翘嘴唇对那酒糟鼻子说：“别跟他罗苏了，他不服罪，带到警察局去！”于是，他们一边一个架着我，硬把我拉到了伪警察局。

不知这两个狗警察给我捏造了什么罪名，一会儿，我就被拉到了思明县伪监狱。

到了监狱，经办人员也不问情由，就叫来两个狱卒，把我按倒在地，打了五十大板，直打得我皮开肉绽，鲜血横流，昏死过去。然后把我扔进了七号监房。

监狱里关了不少象我这样受冤枉的穷苦人。我们动不动就挨骂受打，还要做各种杂工。我被折磨得浑身发肿了，还不许休息。就这样，我在监狱中整整熬了一年。

一天，看守来告诉我：“法院有公文下来，通知你可以出狱了，但必须有保人。”我说：“我从小就孤身一人，叫我到哪里去找保人？既然法院有公文放我出去，那我就要走了。”我出了监狱，往码头上走去，那看守一直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快到太古码头了，正巧碰上过去和我一起扛货的工人廖坤。我请廖坤做保，可是看守却说：“不行”。我问他：“你不是要我找保人吗？现在保人有了，怎么又不行呢？”廖坤却已懂得了看守的心思，就从身上掏出仅有的两毛钱来；还把口袋底也翻出来给他看，对他说：“只有这两毛钱，你买包烟抽吧。”看守知道榨不出更多的油水来了，只得拿了两毛钱灰溜溜地走了。

望着看守远去的背影，我越想越气愤：在这个暗无天日

的社会里，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腐化、官官相护，欺压百姓，如狼似虎。我无意中捡起一张五块钱的叻币，竟蒙受了不白之冤！我恨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家伙，我恨这个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我恨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穷人没有权，只能受欺压。受冤枉的不是我钟友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更不止这一桩一件。我满腔怒火在胸中燃烧，恨不得使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团团熊熊烈火，扑向这个专门欺压穷人的鬼世道，把这鬼世道烧个干净！

三、漂泊远洋 海外受苦

出狱后，全靠穷兄弟们周济了一段时间。可是，我还得治病，就瞒着穷兄弟们向资本家借了五元钱。哪知钱还没到手就先扣去了一元的利息，还要按日还钱，第三天起如果不能还，就要加倍罚款。原来这是一种叫做“日仔利”的高利贷。借了这种“日仔利”，我可真是背上了阎王债。我每天做工得的工钱总是还不够，这样连本带利加上罚款，越滚越多。债主三天两头派人来逼，并且扬言再不还清就要把我抓去。其实，我前后至少也付了二十元钱，他说我还欠他十多元。这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啊！我是不愿再给他钱了，穷兄弟们也说：“已经被他敲榨这么多了，有钱也不能再给他了。可是，给这种人抓去毒打，不死也得脱层皮，不如我们大伙儿凑几个钱给你上外面去另找生路吧。”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上了一艘去新加坡的轮船。

到了新加坡，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到一个卖地瓜汤的华侨妇女那里帮她做做杂工。后来，听说荷兰人开设的火油公司要招一批工人，我就跟几个华侨工人一起去“吃公司饭”——扛火油桶。

为什么叫“吃公司饭”呢？原来当地米价贱菜价贵，公司老板只供我们吃饭不供菜，工头的亲属们就专向工人们出售蔬菜，从中剥削我们。老板借口已经给我们吃饭了，就把工钱压得非常低，再加上工头从中层层剋扣，所以扛一桶火油只能拿到一个铜板。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扛火油桶时流的汗也可以用火油桶来盛了。因为流汗太多，根本吃不下干饭，只好吃稀饭，可是吃了稀饭，来回扛两桶火油肚子就饿了，还得自己掏钱买食物充饥。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算盘可真鬼啊！

老板们怕在闹市容易引起火灾，把他们的火油库设在远离新加坡的一个小岛上，就在海滩边搭一个简陋的木棚，算是我们工人的住所，四、五百个工人都挤在里面。除了一边和中间有两条窄小的通道外，全是睡人的地方。睡觉分上下两层，都是一个挨一个，身不能翻，脚不能伸直。满屋子热气腾腾，好象一个大蒸笼。一到晚上，又有一种细小的海蚊，围着我们嗡嗡不休，叮人就象钢针刺一样，我们也只能光着身子任它叮咬。

为了在我们工人身上敲骨吸髓，洋老板收买了一大批爪牙当工头，工头手下还有爪牙，这在厦门码头叫二手，在新加坡叫“三心”。这批工头和三心手持皮鞭，象一群饿狼疯

狗，到处乱窜，一看不顺眼就用鞭子抽我们。有个工头叫曾水土的，每天天不亮就拿着皮鞭来逼我们出工。我们扛一桶火油，他只给一个铜板的工钱，到底洋老板给了他多少钱，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

一天，正是个大热天。我来回扛了几桶火油，早已是汗流夹背了，又渴又累，嗓子里干得好象要冒出火来。我喘着气吃力地迈动着双腿，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汗水挡住了我的眼帘，我就撩起衣角擦了一擦，脚步不觉慢了一点。忽然，“啪啪”两声，我的后背心挨了两鞭子，顿时觉得一阵麻辣。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心斜着他那双三角眼对我骂道：“别磨洋工，快走！”我说：“天气这样热，擦一下汗也不行？”三心一听，嗖嗖地又给我两鞭子，还冷笑着说：“给你这两鞭子搨搨风，这下凉快多了吧。”说完，转身又向别的工人兄弟追去了，嘴里却还在骂：“这些贱骨头，就是要打！”

洋老板的残酷剥削，工头们的皮鞭和辱骂，使我的心里象火燎火烧般的难受。我决定离开那里，另谋生计。

那时，有人告诉我新加坡殖民当局要招收一批工人去种橡胶和开发原始森林，愿意去的每人先发二百元叻币，到那里有吃有穿，每月还给工钱。我们这些来新加坡不久的华工都不知底细，认为去那里试试看也好，就去报名。但那报名处的洋人一听说我是厦门人，另一个工人是广东潮州人，就对我们连连挥手，表示不要。我当时很纳闷，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过了几天，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华侨老工人告诉我

说，什么去做工、给工资等等，都是帝国主义殖民当局的鬼花招，实际上是要把我们华工卖到深山荒岛去做终身奴隶。由于老一辈的殖民主义者过去在厦门、潮州等地骗卖华工时，遭到过激烈的反抗，尝到了中国人民柴刀、斧头的滋味，所以后来一直不敢要厦门人和潮州人。其实反抗他们的何止是厦门人和潮州人。那些被当作牲口一样贩卖的兄弟们知道受骗后，有的搞断绑在身上的绳索逃跑，有的和殖民当局派来的监工、警察打起来。后来帝国主义殖民当局还是采取各种卑劣手段硬夹走了一批华工。这是帝国主义殖民者对我们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次血腥暴行。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我更加看透了这里同样是豺狼当道的世界，穷人一样受欺压。那我何必老远地流浪到这儿来呢？还是回去吧，虽然我知道回去后也不会有好日子。反动统治者、剥削者们有钱有势，但我们穷工人有一副硬骨头，看这个恶世道能把我怎么样！

于是，我结束了两年海外受苦的生活，拖着一个瘦弱的身躯，怀着满腔的仇恨，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厦门。

四、水深火热 再受煎熬

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屈膝投降。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块地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俗话说：“桐油罐还是装桐油。”我回到厦门后，找不到其他的出路，只好仍旧回到码头上来卖体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厦门，杀人放火，奸淫掠夺，无恶不作。大家不愿受日本鬼子的蹂躏侮辱，纷纷向鼓浪屿等地转移，因此，各种船只上挤满了大人小孩。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出动飞机对大小船只狂轰滥炸，炸死许多同胞，造成轮渡惨案。在太古码头，日本鬼子还抓了许多青年。有个家在曾厝垵的青年趁日本鬼子不备就跑了，不幸才跑出几步，鬼子发觉了，就把他追了回来。鬼子见这个青年竟敢违抗“皇军”的意志，不禁兽性大发，结果，连同这个青年，共有三十八人，都惨死在日寇的机枪下。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太古码头。

看到这悲惨的场面，我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民族恨，决心跑出这个魔窟。

我先是跑到了鼓浪屿。有个小学教师对我说：“你还是到漳州去吧。那里有避难所，在这里也不安全，日本鬼子会随时来抓人的。”我听了觉得有理，就去漳州。可是那避难所的管理人员说我是厦门的，不属漳州管，应该到泉州去，我又只好到泉州去。在这兵荒马乱、日寇横行的年月里，很难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我只好帮人种种菜，或是卖地瓜藤等，苦苦地熬过了几年，直到抗战结束。

日本鬼子投降了。我想，这该是我们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就怀着种种希望又回到厦门。谁知道，冷酷的现实，使我的希望一个个都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日寇八年侵略战争给了我们中国人民巨大的灾难。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还是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派却虎视眈眈地梦想消灭我们共产党，忙于发动内战；那些劫收大员们到处抢地盘，树势力，大发“胜利”财。厦门码头的统治者仍然是三大姓的封建把头，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官僚政客以及一些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庇护的汉奸走狗。祖国的山河也仍然被帝国主义者随意占领。当时，鹭江上开来了一艘艘挂着星条旗的军舰，码头上游荡着一群群美国少爷兵。他们骄横跋扈，恣意欺凌侮辱我们码头工人。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腐败，经济一天天崩溃，他们对码头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加强压榨和剥削，码头工人的生活真是苦上加苦。

那时，我在海上做装卸工，轮船来了，就到船上去卸货或装货。

有一天，我们在英轮“花亚旗”上卸铁条。铁条又长又重，大家抬着走不快，前面的还没装上驳船，后面的又上来了。我正好是走在后面的，船上的洋二副嫌我们抬得慢，就提起他的狗腿重重地踢了我一脚。我大声抗议：“为什么踢我？”工头闻声赶来，为了讨好洋主子，就奚落我：“谁叫你眼睛不灵？天生挨揍的货！”我回敬他一句：“你的眼睛太灵，所以只看见洋大人。”工人们一听都笑了，工头可就火了，要来抓我。当时，工人们都抬着铁条，见他上前来，便一齐用手挡住他，并大声喊着：“让开，让开，小心铁条砸了脚。”这家伙碰了个软钉子，见我们人多势众，直气得

干瞪眼，只得怏怏地走了。

就这样，我一天又一天地在苦日子里煎熬着。

我从十四岁来到码头，一直是孤身一人。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四十五岁了，才在工人兄弟的关心帮助下和一个象我一样受苦的寡妇结了婚。我爱人以前的丈夫死了，她四个孩子饿死一个，卖掉两个，只剩下一个五岁的女儿。说是结婚，其实不过是三个受苦人凑在一起，两个穷家并成一家，穷上加穷罢了。

我结婚后，拣了些稻草、破铁片，在下马柱搭了个破草房安家。为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我经常是从早上到晚上，再从晚上到早上，连续二十多小时都在码头上干。海船上的活干完了，就到码头上等散工的活计；困了，就在马路边打个盹。但就是这样死命地干，一家人还是吃不饱，我爱人还得找点杂工做，或者到菜市去拣烂菜，帮助维持家庭生活。

我们工人的生活这样苦，可国民党反动派还要从我们骨头里榨出油来。一天深夜，保长忽然破门而入，查了户口，接着就要我缴五元美钞的壮丁费。我吃了一惊，就问：“我已经四十五岁了，还要出壮丁费吗？”保长冷笑着说：“让你出壮丁费是便宜了你，不然，你就去当壮丁吧。”我和爱人东借西挪，奔走了好几天，才凑足了五块美钞，付清了这笔所谓“壮丁费”。

苦日子一直熬到了一九四九年。那时候，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那些

大大小小的反动军政头目纷纷带了他们的残兵败将来到厦门，准备随时向金门逃窜。一天，我和一些工人到码头上去干活，这些家伙正在把大炮装上船。这些大炮不久前才卸下来的，怎么又要装上去？噢！我们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批瘟神要逃跑了。我们大家兴奋地互相转告：解放大军快来了，我们的好日子就要盼到了！

五、翻身解放 永远革命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照亮了鹭江。一九四九年十月，厦门解放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从无边的苦海中救了出来，码头工人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我这个在旧社会被资本家、工头、流氓、国民党反动军警、帝国主义洋奴们踩在脚底下的“苦力”、“乌鬼”，光荣地当选为工人代表，出席了市工人代表大会。当市长和我热烈握手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开会期间，有一次一位女干部见我流汗，赶忙拿毛巾给我擦汗。我不禁回想起解放前的牛马生活。那时，我们扛着沉重的货箱，浑身是汗，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嫌我们汗臭，一见我们就捂着鼻子躲开。反动警察更是凶横，说我们这些“臭苦力”睡在街道旁“有碍市容”，拿着棍棒驱赶我们。在新加坡扛火油时，就因为擦汗，挨了三心的谩骂和鞭打。今天，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工人阶级掌了权，我才能受到这样的尊重和关怀。抚今思昔，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

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解放后，我那件穿了二十多年的破棉袄被送进了阶级教育展览会，领导上发了钱给我做新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新棉衣。穿上它，我不但浑身上下都感到温暖，心窝里更是暖烘烘的。

现在，我的几个儿女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最小的儿子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七三年复员后在外贸局汽车队工作。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上两个女儿处去玩玩？”我想，我虽然退休了，但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怎么能拿了国家的退休金到处玩呢？所以我坚持在运输合作社烧火兼看管门户。工作虽然平凡，但这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啊。

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使我深深地懂得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永不变色。因此，千条万条，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根本的一条。

当我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有责任把我解放前的苦难和今天的幸福告诉年青的同志们。愿我们新一代的年青人，永远不忘老一辈所受的阶级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接好革命班，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血海深仇

——搬运女工蔡来春血泪家史

“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收音机里传来了这高亢有力的唱腔。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不屈的吴清华的形象：她的身子被吊在半空，双臂上露着一条条伤痕，南霸天的狗腿子老四还在用皮鞭下死劲地抽她，问她还跑不跑，吴清华昂首面对狗腿子响亮地回答：“跑！打不死就跑！”……渐渐地，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不屈的女孩子，她的爷爷、爸爸、妈妈、两个弟弟都被吃人的旧社会逼死了，她自己在地主家里当牛作马，此刻，她的衣服在冒烟，头发被烧焦，狠毒的地主婆用烤得通红的火筷子向她全身到处乱烫。她挺身怒对地主婆，要夺过地主婆手中的火筷子。……她，就是今天厦门市搬运公司厦港搬运站的女工蔡来春。

蔡来春今年四十六岁了。她的身上，至今还清晰地留着地主婆烫她的一条条烙印；她的心头，永远铭刻着旧社会给她一家的血海深仇。这条条烙印，这深仇大恨，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铁的见证。下面记录的就是蔡来春对那吃人的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一、爷爷的血

我原姓朱。我家本来住在厦门对面的南太武山，家里穷透了底，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顶漏雨、四壁透风的破房子里。爷爷给地主扛长工，爸爸到处给人打短工、干零活。两代人拚死命地干活，家里还是经常揭不开锅。

可是，凶恶的地主连这样的穷日子也不让我们过下去。他长年累月地压榨和剥削我们还不够，又进一步向我们伸出了血腥的魔掌。终于，一场大祸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这是发生在一九三二年我四岁那年春耕大忙季节的事。

爷爷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去犁田。那天，他空着肚子一直干到中午，地主还不让他休息吃饭。爷爷年老体弱，一下子就饿昏在田里。地主的儿子走来看见了，不但不让爷爷去休息，反而大骂爷爷是偷懒。爷爷强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去扶犁，走不多远，铁犁头碰在一块石头上就断了。这狗崽子看见，硬说是爷爷有意弄坏的。爷爷气不过，顶了他几句，这狗崽子就拳打脚踢，打得爷爷满脸是血，又昏了过去。可是，这狗崽子还不肯罢休，又跑回去向他的地主老子告状。老地主一听，立刻拿了一根头上用铁箍着的大扁担赶来，一面骂爷爷是装死，一面举起扁担对爷爷就是一顿毒打。可怜我那六十二岁的爷爷，肩胛骨被打断，当场惨死在田边。爷爷的血，从田边直流到沟里，连沟水也染红了。

爸爸妈妈正在别处干活，听见乡亲们来报讯，急忙赶到

地主家里向他要人。这个狗地主是当地的一个土豪，一贯仗势欺人，蛮横霸道，一见爸妈就凶相毕露，二话不说，操起一根柳条棒就向妈妈头上打来。妈妈没有提防，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棒。爸爸不禁怒火冲天，全力向地主扑去，同时大声质问狗地主：“你打死了老人，还想打死我们一家？我和你拚了吧！”地主的狗腿子轰地拥上来，一把抓住爸爸，要下毒手。乡亲们怕爸爸再吃亏，就硬把爸爸拉回了家。大家对爸爸说：“你赤手空拳，还不是叫他们白白打死？活着才能报仇啊！”爸妈抱着我，围着爷爷的尸体放声痛哭。这哭声，冲破九天，传向四方；这哭声，控诉着旧世界的黑暗，豺狼们的暴行！

家里，穷得没有一个铜板。爷爷的尸体都发臭了，还无法收埋。爸爸妈妈急得团团转。这时，恰巧有个姓蔡的厦门人，也是穷苦人家，夫妇俩年近半百，没有子女，想要个孩子。爸爸妈妈那时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为了安葬爷爷，就忍着心疼把我给了蔡家。爸爸妈妈就用蔡家送的几块钱草草地安葬了爷爷。

二、父子双亡

爷爷死后几年，生活更困难了。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家里的灶头经常是冷冰冰的，两个弟弟饿得直哭。爸爸妈妈听说城市容易找工做，我和蔡家又在厦门，就变卖了家中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七凑八凑，勉强雇了一条小舢板，漂泊在

到厦门。

厦门，这个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就遭受帝国主义侮辱、蹂躏的城市，这时正遭受着日寇铁蹄的践踏。虽然是高楼大厦林立，可就是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一家人只好栖宿在一个偏僻的走廊上。

起初，爸爸每天起三更到处找零工做，但零工杂活也经常找不到。大弟弟终于饿病了。爸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出去要饭。为了讨一点饭回家，爸爸总要等人家吃过晚饭天黑后才能回来。有一天，天黑得看不见路了，爸爸才往回走。他饿得头昏眼花，一不小心，脚被碎玻璃划了一大道口子。因为没钱医治，伤口发炎了，腿肿得越来越大，脓血直流。过了几天，大弟弟饿得奄奄一息。爸爸怎能眼看着弟弟饿死呢？就硬支撑起身子出去要饭。妈妈托人带口信到养母家告诉我，说大弟弟快不行了，要我回去看看。第二天天没亮，我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可是已经晚了，踏进家门，只见妈妈抱着大弟弟那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尸体在嚎啕大哭。可怜我那弟弟，生下来的七个年头中，没吃过一顿饱饭，终于被饥饿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我哭了好久，才发现爸爸没在家。一提起爸爸，妈妈更焦急了，她告诉我爸爸是昨天出去要饭的，一夜没有回来，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听，拔腿就往门外跑，穿大街，过小巷，还是看不见爸爸的影子。我急得一路哭着叫着。后来到了一条路边，听见不远处有呻吟声。我急忙跑过去，啊！是爸爸。爸爸的右脚肿得比碗口还粗，伤口上是脓血混合着泥

土。原来，昨天爸爸还没要到饭，却在过一条马路时碰上了豺狼成性的日本鬼子兵。他们见爸爸拿个破碗是要饭的，就伸出穿着皮靴的狗腿，挥舞着拳头，往爸爸身上猛踢乱打。爸爸饿得虚透了的身子，怎经得起这群野兽的残暴殴打？就昏死过去了。爸爸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便慢慢往回爬。爬一阵，又昏过去了，醒过来再爬一阵，最后实在爬不动了，就躺倒在路边。听了爸爸的叙述，我真恨死了这伙日本法西斯强盗。想到爸爸饭没要到反而受了欺侮，而大弟弟已经饿死了，我的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滚落下来。

我扶着爸爸困难地往回走，半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大娘。她知道了爸爸的遭遇后，非常同情我们，就端了一大碗野菜碎米饭给我们，这是当时劳动人民最好的饭食啦！我们十分感激老大娘的阶级情意。可是爸爸带的一个破碗早被日本鬼子打丢了，找不到盛饭的东西，只好卷起裤管把饭装了进去。爸爸一手扶着我，一手捏着裤管，走几步，喘口气，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总算挨到了家。

爸爸得到一点饭，满心欢喜，回到家里，张口就叫大弟弟。这时，妈妈和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齐大哭起来。爸爸急步走到床前，一见大弟弟的尸体，身子一晃又倒了下去……

弟弟死后没有装裹的东西，我只得到各个垃圾箱去找。正好见一个大娘要扔掉一捆绳子，我就向她要。她说：“太脏了，不能用。”但我还是把这捆绳子拣了回来，找几张破纸把弟弟包了；又用这绳子捆了几下，就把弟弟埋了。弟弟那铁青的瘦削的脸，那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幼小的身躯，几十年

来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啊！

爸爸的腿越肿越厉害，整天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一天晚上，北风呼呼地叫，天空阴沉沉的，我从养母那里回到家中。爸爸一见我，一面呻吟，一面叫我在床边坐下。他抚摸着小弟弟的头，吃力地对我说：“爸爸不行了，你弟弟还小，你可要记住爷爷是怎么死的，你大弟弟是怎么死的，爸爸又是……我们祖孙三代都死得冤枉呀！”爸爸喘着气，歇了一阵，又强打起精神说了下去：“来春呀，当你出生的时候，我和你爷爷、妈妈都盼望好日子快来，因此给你取名叫来春，可是……好日子我已经盼望不到了，只希望你和弟弟能盼来好日子……”说到这里，爸爸一阵气塞，就说不下去了。突然，他举起拳头，狠命地往床上一捶。我拚命叫着：“爸爸，爸爸！”爸爸再也不能回答我了，可是他的拳头还紧紧地握着。爸爸是恨不得举起铁拳把这恶人当道的旧世界砸个粉碎啊！

爸爸死后，我们把家里所有能卖的破烂东西都卖了，还向同乡借了五块钱，才凑得十三块钱，买了一副薄板棺材。因为还少三块钱的埋葬费，棺材店老板沉着脸吩咐他的伙计们：“你们把棺材抬上山去就算了，不要给他埋。”到了山上，他们丢下棺材就走。我们母子三人急得直哭。到了中午，有个长工路过那里，看到这种情景，对我们十分同情，就把手里的锄头借给我们，还教我们怎样挖坑。过了一会，长工吃饭去了，我们在继续挖坑。突然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人来到我们身边。他的贼眼先把我们娘儿仨挨个儿扫了一遍，

最后停留在那把锄头上，就恶狠狠地骂起来，说我们偷了他的锄头。原来这个人雇那个长工的狗地主。那时我耐不住，便和他顶撞起来。他抢过锄头要打我，妈妈连忙过来护住我，大叫：“不许打孩子！”并说：“你说锄头是你的，你拿走就是了，凶什么？”可是那狗地主还不依，硬说我们用他的锄头挖坟坑冲了他的“财气”，一定要我们买香烛红蛋红糕等彩礼。妈妈见他纠缠不休，为了让他快走，就说：“今天我没钱买彩礼，过几天给你送去。”狗地主一听，两只贼眼骨碌碌朝弟弟身上乱转，又出了坏主意，转眼间，收起了凶相，换上了一副似笑非笑、不阴不阳的面孔，对妈妈说：“你说现在没有钱，就宽限你几天，只是有一条：让你那男孩子跟我去，你要是愿意，我就养着他；你要舍不得，等你送彩礼来就把他接回去……。”妈妈不等他说完，就说：“这可使不得！”这地主又假惺惺地说：“我这是好心，孩子到我家有吃有穿，不比跟着你强？再说你只要把彩礼拿来，我就让他走，我在这一带有名有姓，还能赖了你的孩子？”接着他又怪声怪气地告诉妈妈一个地址，伸手从妈妈身后拉过弟弟就走。

妈妈本来就伤心过度，见弟弟竟这样被硬拉走，又气又急，张着嘴要叫弟弟，声音还未叫出来，人却一下子晕倒在地上了。我想去追弟弟，见妈妈晕倒，只得扶着妈妈叫唤。真是顾了妈妈，又顾不了弟弟。我守着昏迷的妈妈，听着逐渐远去的弟弟那撕裂人心的哭声，再看看眼前尚未入土的爸爸的棺木，犹如万箭钻心，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妈妈在我的

哭声中渐渐醒了过来，母女俩就相对而哭。我要去讨弟弟，妈妈说：“不行呀，你要去了，这个天杀的狗地主说不定把你也扣下了。”母女俩只得强打起精神，一起折断了几根树枝做棍棒，连拖带抬勉强把爸爸的棺材埋入土中。

三、母亲惨死

小弟弟被抢走后，妈妈按地主说的地址去找小弟弟。哪知道这个坏蛋告诉妈妈的是假地址，到那里一问，根本没有这个人。妈妈只得一个人自找生路。听说妈妈起先在一个资本家家里做佣工，不久，又被解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得不到妈妈的音信。后来，遇见一个老邻居，她告诉我妈妈现在到处流浪，以乞讨为生。这时，养母因为生活困难，把我送到一个地主家里干杂活。地主婆一天到晚使唤我忙个不停，干不完活就要打，根本不让我出门，因此我一直没办法去找妈妈。那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妈妈了。在她惨死后，我才见到她那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是一九四四年我十六岁那年的事。

农历九月十九日，是佛教所谓观音大士的生日，南普陀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妈妈想到那里去要一些饭食。她走累了，就坐在南普陀附近的“钻钱洞”那堆石头上休息。那年头，到处都是穷人的灾难。刚坐下，就来了一队日本鬼子。日本法西斯强盗从来就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见了穷苦人更是穷凶极恶。为首的那个鬼子兵骂了一声，手舞刺刀就向妈

妈扑来。妈妈想跑，哪里来得及？日本鬼子豢养的两条大狼狗也逞着主子的威风，张着血红的眼睛，扑在妈妈身上乱咬。可怜的妈妈，转眼之间，就在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刺刀和狼狗的牙齿下丧了命！可是比狼狗还要凶恶百倍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为了发泄他们的兽性，又把正牧放在附近的猪、牛赶过来糟蹋妈妈的尸体。附近的乡亲们见了都摇头垂泪，悲愤难言。有的想上去把猪、牛拉走，却被鬼子的刺刀驱散了。等我得到讯息赶到那里时，只见地上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妈妈的面孔已被狼狗撕咬得分辨不清了。我见到这副惨象，直觉得天旋地转，立刻昏倒在地上。

乡亲们过来围着我劝解，一面咬牙切齿地怒骂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暴行。我愤恨到了极点。这时，日本法西斯狗强盗早溜走了，要不，我一定冲上去撕他们的皮，咬他们的肉，和他们拚命。天快黑了，我还坐在那里哭一阵、骂一阵。乡亲们劝我：“天黑了，快点回去吧！鬼子兵毫无人性，一个姑娘和他们硬拚是要遭毒手的。你妈妈死了，你自己可要保重啊！”又有人接着说：“日本鬼子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中国老百姓，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恨，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仇恨啊！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些狗强盗统统赶出去的！”听了大家亲切的劝告，我的心里开了一点窍，懂得了这不是我一家的苦、一人的恨，这是阶级仇、民族恨啊！我擦干了眼泪，站了起来，拾起了妈妈遗留下来的一根打狗棒。不论遇到什么种类的恶狗，我都要举起它狠狠地打过去！

四、幼弟暴卒

被地主抢去的小弟弟，妈妈活着的时候没能找到他，妈妈死后不久他自己却回到我养母的家里，不止一次地偷偷跑来找我。那时，我在地主家做工，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时常因为肚子饿偷跑回养母家吃饭。弟弟每次来，我就把养母留给我的一点饭给他吃。但对妈妈的惨死，我怕引起他的伤心，还一直瞒着他。

一天中午，弟弟又哭着跑来了。只见他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不用说，又是遭了地主的毒打了。他扑在我怀里哭着说：“我再也不进地主家的门了。”我问他：“你不进地主家的门，要上哪儿去呢？”他说：“我找妈妈去。”提起妈妈，我禁不住一阵阵心酸，见到弟弟这样受折磨，更是难受。我强抑着悲痛，骗他说：“妈妈好久没音讯了，不知在哪儿，你怕也找不到……”弟弟却坚定地说：“狗地主天天打我，就是找不到妈妈，我也宁愿饿死在外面，怎么也不进地主家的门了。”是啊，地主家是火坑，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再往火坑里跳呢？可是，旧社会哪一处不是穷人的火坑啊？弟弟才八岁，叫他到哪里去安身呢？我自己，也在地主家受苦，毫无办法养活弟弟。弟弟见我呆呆地说不出话，知道我心中难受，他人小却很懂事，说：“姐姐，我走了，你早些干活去吧，别让地主婆又骂你。”听了弟弟的话，望着他渐渐远去的瘦小的身影，我的心象被摘去了一

样，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猛烈地燃烧……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一个老邻居跑来找我，告诉我弟弟死在厦港沙坡尾附近的垃圾箱旁。顿时，我的头象挨了雷炸电击一般，我只是机械地跟着老邻居一口气跑到那里。我那可怜的小弟弟衣不蔽体地扒在垃圾箱上死了。我把弟弟冰冷的身子紧紧地抱着，无声的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看见弟弟衣服破烂，我就把自己身上的破夹袄脱下来往弟弟身上裹。这时，我看到弟弟全身是黑的。这是他饿得没法，吃垃圾箱里的腐烂食物，中毒死的啊！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我也明白，他这样幼小的年纪到处流浪，即使不中毒，也会活活饿死啊！这个恶世道逼得我们穷人实在走投无路，它又夺走了我最后一个亲人。

我的眼泪已哭干了。我的五个亲人，是旧社会、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地主阶级杀死的。但是，穷苦人是杀不绝的！血债须用血来还！亲人的鲜血浇灌着我内心仇恨的种子，头顶磨盘我志不屈！我要挺着身子活下去，我要报仇雪恨，向旧社会讨还血债！

五、狼窝虎穴

我在地主家做杂工，真是干不完的活儿，受不尽的打骂。一天，我挑了两桶大粪到田里浇菜。担子重，田埂高，我个子矮小，挑着担桶跨不过去，便把担子放下来，想站在田埂上再把粪桶拎过去。这时，地主的儿子看到了我，跑过



来不问情由就骂我偷懒，一面抓起粪瓢，劈头盖脑地向我打下来，打得我浑身污秽，眼前直冒金花。

我强压下满腔怒火把粪浇完了，跳进附近的池塘冲洗了一下头发衣服，回到地主家准备烧猪食。不料地主婆和她的儿子早已等在那里了。狗崽子无中生有，倒打一耙，对地主婆说是我贪玩，打翻粪桶，才跳到池塘里洗的。地主婆一听，满脸横肉一抖，立刻从灶肚里抽出烧得通红的铁筷子，往我头上、身上各处雨点般地打下来。火筷子打到哪里，哪里就“嗤”的一声冒起一缕烟来。我咬着牙，忍着剧烈的疼痛，不哭不喊，只是挣扎着想夺走地主婆的火筷子。但我一个女孩子，手无寸铁，怎抵敌得过这虎狼似的母子两人？我的头发着了火，衣服被烧成了碎片片。起初，我还痛得在地上直打滚，不一会儿，便昏死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四顾无人。我忍着剧痛，爬进了一间堆放柴草杂物的小屋子，借着惨淡的月光，抚摸着遍体的伤痕。顿时，爷爷、爸爸、妈妈及两个弟弟惨死的情形，一一在我眼前浮现。忽然我又想起了爸爸临死前说的关于我名字的来历。我的名字是充满了希望的，可是我从小到这么大，只知道有钱人的心是狠的，穷人的生活是苦的。这人间都是穷人的血和恨，哪里有什么春天？春天呀，你什么时候才会来临？什么时候才能杀尽狗豺狼，让我们穷人报仇雪恨？

第二天，火辣辣的阳光射进柴草房，整个小屋子象蒸笼似的又热又闷。我发烧、口干、浑身针刺似地疼痛。我想挣扎着冲出去，可是我已被饥饿和伤痛以及闷热的天气，折磨

得没有一丝力气了。再加上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地主婆的火筷子烧成了碎片片，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怎好这样在大白天出去？我只好一直忍到太阳下山，黑暗笼罩着大地，才爬出草房，躲进小巷，扶着墙壁，一步一步挨到养母家。

恶人先告状。地主婆烫伤了我，心虚理亏，怕养母找她评理，就先发制人，跑到养母那里说了我无数的坏话，还叫养母对我“严加管教”。我回家哭诉了真情，养母就把我留在家中养伤。

不久，那地主婆为了要我去干活，又换了一副嘴脸，到我养母面前假惺惺地说了些好话，三番五次催我去。养母迫于生计，只好叫我再到地主家。一到那里，地主婆就变本加厉地虐待我。他们一家大小吃完饭，马上把饭钵收拾进去。我要去盛饭，地主婆劈手就把饭勺夺了去，把我推在一边。我只好从煮给猪吃的地瓜中挑出几块较好的拿来吃，勉强充饥。

除夕夜，地主一家围着饭桌大吃大喝，我却只能坐在门口吃地瓜。他们吃得满嘴流油，见我在吃地瓜还不甘心，那地主婆冲过来，抢走了我手中吃了一半的地瓜，指着已经存放了好几天的猪吃剩的饲料说：“要吃，就吃那些！”真是蛇牙虎齿蝎子针，再毒毒不过地主婆的心。我忍无可忍，呼地一声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决心再也不踏进地主家的门了。这时我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虽然从我身后传来了地主家的一片叫骂声，但在我听来，只象是一群碰壁的苍蝇在嗡嗡叫。

过了一些时候，我在一个手工业作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摇绳子、拉线。有个和我一起做工的大娘见我勤快，很喜欢我。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婆母。

我是一九四六年结婚的。这时日本狗强盗已被赶走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遭殃军同样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我们穷人还是时时遭殃。

那时候，拉线的活计不多。我住在沙坡尾，靠近海滩，见经常有渔船来，我想：凭我的体力，多挑些鱼是没有问题的，就跑到渔行要求挑鱼。渔霸见我是个女的，就说：“要来挑鱼可以，但工钱不能和男工一样；你愿意就干，不干就算。”为了养活家口，我咬咬牙答应了。可是从渔船挑鱼到渔行，必须经过码头。码头上的工头又横插过来对我发话：

“这码头是属我所管，你挑鱼路过我这儿必须纳税，否则你就别想过去！”挑鱼工本来工钱就很低，而我们这些临时雇的女工，经渔霸再压低工资，工头又抽去三成税，我们到手的工资只有一般挑鱼工人的一半，辛苦一天还买不到两斤米。

一九四八年开始，解放战争形势大好，解放军长驱南下，所向披靡，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败退，逃窜到厦门来的遭殃军越来越多，闹得鸡犬不宁。他们大白天在街上见东西就抢，见我们女工挑着鱼，伸手上来抓三条五条是不算一回事的，有时整担鱼都给抢走。有一次，我正挑着鱼，几个遭殃军一把抓住了我后面的一个箩筐。我知道不妙，一面大声呼喊，一面奋力抢夺。他们人多，一筐鱼就被他们硬给抢走

了。到了渔行，资本家叫管账的把算盘一拨，就叫我赔钱。我累死累活白挑了几天鱼才赔清了这笔钱。没有办法，我只得放下挑鱼的扁担，另找生路。后来，好不容易，才在泥水匠作业班里当了一名小工。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日子真没法过。挑鱼时，遭殃军来抢鱼，这已够糟了；谁还想到，他们竟会在大白天闯进人家家门偷小孩去卖呢？

那时候，我和爱人天天出外做工，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由婆婆看着。一天，我中午下工回家，只见婆婆急得一头大汗在那里乱转。原来婆婆在孩子睡着后，有事到邻居家去了一下，只一会儿工夫，回来一看，孩子不见了。我急得发疯似地往外跑，见人就打听孩子的下落。有个人告诉我他看见一个遭殃军抱着孩子向第一码头走去了。我一口气追到了第一码头，只见一群人围着看打拳。再一看，附近地上躺着一个婴孩，正是我的孩子！我一把抱起孩子回身就跑，深怕再被抢去。事后大家谈论起来，才知道那遭殃军闯进我家是想偷点东西，可我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就把孩子偷走，抱到第一码头，想卖几个钱。但在那种年头，老百姓谁买得起孩子呀？他一时找不到买主，只得先把孩子往地上一放，钻到人堆里看打拳去了。如果我晚一步赶到，那遭殃军又不知会把孩子抱到哪里去卖了，真好险哪！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工人是被三座大山压在最底层的人啊！我们过的日子，犹如在火山上滚，在油锅里熬。

六、枯木逢春

鹭江水再深也有底，穷苦人的生活再苦也有边。当我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解放军的炮声时，立刻象春雷驱散了满天乌云一样，心里充满了希望。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厦门岛，春天，终于来到了。我爷爷和爸爸、妈妈生前所盼望的好日子，终于来到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斗倒了封建把头，旧社会的“苦力”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妇女的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和男工人一样参加管理国家大事。解放后，我又当了挑鱼工人，后来和其他码头工人一起归并到市搬运公司。每天干活，我都感到浑身是劲，永远不知道疲劳；二百四十斤一包的糖，一百八十斤一包的盐，我都抢着往肩上扛；开起重机、拉板车，我也都能干。党和毛主席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遇到困难时，只要想起毛主席，我就能知难而上，就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解放后，我先后参加了市工人代表大会、市群英会。特别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受搬运公司革委会和工人同志们的委托，参加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立红小学和革命师生一起进行学校的斗、批、改。在旧社会，我们是“饿死路边无人问”的穷苦人，学校的大门连边也不敢挨，哪想到有这一天，我竟能作为一个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光荣的工宣队员，踏进了学校的大门，为巩固无产阶级

教育阵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怎不叫我激动万分呢？我由于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压，没有文化，凭着一颗忠于毛主席的赤诚的心，凭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阶级责任感，按照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克服困难，大胆地进行工作。当时，学校里有个别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思想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一面耐心地对这个教员进行忆苦思甜，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一面狠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散布的“读书无用论”、“文化工作危险论”等反革命谬论，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掌好教育大权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意义，从而发挥了他的积极性。

旧社会夺去了我五个亲人，我长期孤苦伶仃地过着奴隶生活。现在，我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幸福。解放前被国民党匪军偷去差点被卖掉的儿子，已于一九七〇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小的女儿才八岁，正在小学念书。每当我小女儿蹦蹦跳跳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我就经常想起在旧社会饿死的两个弟弟，他俩饿死的时候都只有八岁啊！

旧社会的苦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梦想篡夺无产阶级的大权。为了确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红色江山，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的基本路

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直到最后的胜利！

两个时代两个天

——退休码头工人郑尚贵家史

我活了六十六岁，苦了四十一年。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在穷人头上，穷人象在活地狱里受熬煎一样，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史？就说我们家吧，在旧社会，惨遭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工头的迫害，一家七口人，死的死，卖的卖，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几次差点被折磨死。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苦海里救了出来，使我和千百万穷苦人一样，翻身做了主人。我要不忘昔日苦，牢记今日甜，跟着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地主逞凶 家破人亡

我老家在浙江省平阳县牛廖洋村。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有五个儿子，我数最小。父亲除开点荒地耕作外，还给地主打短工，替渔行老板挑鱼，整天累死累活地干，还养活不了一家人。

那时，家乡常闹灾害。有一年发大水，把地里的庄稼全

冲光了，一家人没吃的，逼得父母含悲忍泣地卖了二哥。不久，又遇上几十年未有的大旱，连山上的野菜也给晒死了，生活更没法过下去了。村里姓陈的地主，乘机大放高利贷。父亲明知借高利贷是往火坑里跳，可是为了一家人活命，只得横下心向姓陈的地主借了十块钱，月利二十五分，本利打滚，不到半年，就背了三十二元的债。狠心的地主天天上门逼债，父母走投无路，只好再把四哥卖给人家。

那天，买主来相四哥，交下了几块钱做定金。那姓陈的地主听到消息，就带着狗腿子上门来逼债。他一进门就摇晃着脑袋，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呵，这回你卖了孩子发了财，别忘了交清我的债！”父亲痛苦地说：“这是剜心头的肉呵！”狗地主“哼”了一声，恶狠狠叫道：“管你什么心头肉腿头肉，欠我的债，赶快把钱拿出来还清！”父亲说：“人家还没给钱呵！”狗地主冷冷一笑，气汹汹地说：“好呵，你想赖账！”说着，便对狗腿子喊了声“给我搜！”几个狗腿子象恶狼似地扑了上来，从我父亲身上搜出了那几块钱的定金。狗地主奸笑两声，立即露出狰狞的嘴脸：“就这么一点点？你想把钱藏起来，是不是？”父亲答道：“不是对你说了，这是几块钱的定金，钱人家还没拿来。”狗地主没等父亲说完，就对狗腿子挥手道：“给我把屋里搜个遍！”狗腿子就象强盗一样满屋子乱捣乱翻了一阵，可是再怎么搜也搜不出钱来。那狗地主不甘心，连骂带嚷地喊道：“妈的，不给你这穷鬼一点厉害看看是不行的。来人，搜不出钱来，就把这锅钵床板都给我砸烂！”父亲再也忍不住了，冲着地主的

脸骂道：“你比豺狼还狠毒，真不叫咱穷人活呀！”地主气急败坏地吼叫起来：“哼哼！你想造反了！来人，把这个穷鬼给我捆起来带走！”几个狗腿子象疯狗似地向我父亲扑了上来。父亲憋不住满腔的气愤，奋力抵抗。那些狗腿子大打出手，吓得我们几个小孩子哇哇直哭。

这时，狗地主抡起扁担就要朝我父亲打来。母亲赶紧奔了上去，用身子挡住父亲，示意父亲快跑。父亲觑个空，从后门跑走了。狗地主抓不到父亲，恼羞成怒，叫狗腿子把我家里的东西捣得粉碎。母亲急了，上去跟狗地主评理。地主的狗腿子抓起扁担要打母亲，母亲抓住狗腿子的扁担不放。那狗地主便冲过来朝母亲的肚子猛踢了一脚，母亲一声惨叫，倒在地上，口里吐出大口鲜血。我和几个哥哥一起扑在母亲身上狠命地摇着，哭叫着“妈妈，妈妈！”可是，母亲再也不能说话了。地主把手一甩，带着狗腿子就溜走了。这时，我们看见四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哥走到四哥身边拚命叫喊，四哥也没有吭声。原来，可怜的四哥，竟在这群灭绝人性的坏蛋大打出手时，被活活踩死了。

父亲回来，看到家里的惨状，就抱住母亲和四哥的尸体撕心地恸哭着。左邻右舍的穷兄弟看到这种惨状，也都悲愤地落下了眼泪。父亲抓起菜刀，要冲出去和狗地主拼命。大家围住了他，劝他不要硬拼。那姓陈的狗地主不但是乡里的大地主大恶霸，他的亲戚还是平阳县里的大官。权在人家手里，我们穷人的冤仇苦楚向谁申诉呵！

这时，家里躺着母亲和四哥的尸体，父亲的袋子里没有

半分钱。第二天，父亲只得强忍悲痛，把我也卖给人家，换来一点钱，草草收埋了母亲和四哥。

卖身为奴 当牛作马

父亲把我卖给邻村一个富农。我这个六岁不到的孩子，便成了富农家的小奴隶。养猪喂鸡，拾柴火抱小孩，什么杂活都得干；第二年又要上山放牛。每天吃的是混着沙子的地瓜渣，还填不饱肚子；睡的是牛棚猪舍边上的空地或者是猪灶旁的稻草堆。富农和他那恶婆又对我百般刁难。比如，婴孩一哭，就骂我抱得不好；牛肚子瘪了，就骂我喂不饱；常常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多你这个死囤，会吃不会做！”被他们骂不算，动不动还要挨他们的乱棍毒打。每逢他们无理打骂的时候，我连地瓜渣也别想吃了。由于这样的摧残折磨，我八九岁了，个子却比一般同年岁的孩子矮瘦得多，脸蜡黄得没一点血色，只剩下个皮包骨头。

这富农对待雇工也非常凶残刻毒。他要雇工每天替他干十三四个钟头的活儿，给雇工吃的地瓜渣稀得象清汤一样，还寻找种种借口克扣工钱。雇工们都恨死了他，骂他是“陈剥皮”。

有一天，我累病了，发着高烧，起不来，那富农冲到猪灶旁用脚猛踢我：“小懒鬼，你不想活了，还舒舒服服在这里睡觉，看我不揍死你！”说着，抓起灶口的拨火棍没头没脑朝我打来。我年纪小，抵抗不过，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红一

块。他打得没力气了才住手，又把我拉到门外，扔给我一只大箩筐，饭也不给吃，就要我上山割草。我一跛一拐地到了山上。有几个上山砍柴火的穷苦人看到我被打成这个样子，都很同情我，他们把仅有的一点锅巴稀粥分给我吃，还采了草药给我敷伤。我就象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哇哇地放声大哭，向他们诉说我的遭遇。

傍晚，我拖着满满一箩筐的柴草一步步捱回富农家。富农婆站在门口，一看见我，就瞪着眼恶狠狠地问道：“怎么这样迟才回来？心玩野了？”说着，走过来死劲地拧我的耳朵。我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我没有哭，只有恨上加恨。富农婆还不罢休，当我歇下来要吃饭时，她又冲过来抢走我的碗，摔个粉碎。我拖着满是伤痕的身躯，蹒跚地回到猪灶旁躺了下来，又痛又累又饿，一夜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沾湿了我头下的一片稻草。我想起白天山上那几个穷苦人对我说的话：“他们再要欺负你，你就跑。”对！不能呆在这里再受这份苦罪了，回家找父亲去！天没亮，我就起身走了。

从富农家到牛廖洋有四五十里地，要翻过几座山岭。我朝着那几个穷苦人给我指点的方向，边走边问，走一程歇一阵。这样摸摸撞撞地走了许多弯路，才找到了牛廖洋。

刚回到家，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认不出我来了。夜里，我们一家四口人围坐在一起。我对家里人诉说了富农家的罪恶和我的遭遇，大家又愤怒又难过地掉下了眼泪。两个哥哥对父亲说：“阿爸，别让阿弟去受罪了。只要阿弟留在身边，

就是不吃饭我们也心甘情愿。”父亲没吭声，只是淌着泪，半晌，才痛苦地说：“孩子，不是阿爸心狠，是富人心肠毒呵。人家又是伪保长，县里的官府又有他的人，有权有势，知道你跑回来，要讨回卖身的钱，我们拿什么给他呀？”我听了，喉咙里象哽住什么说不出话来。夜里，我又是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我眼前浮现出父亲白了的头发，满脸的皱纹，伤心的泪水，耳边响起哥哥关于这些年收成不好，家里又背上一身阎王债的诉说。这暗无天日的社会，处处是穷人的火坑，步步是穷人的陷井呀！想到这里，我咬咬牙，把满腔的仇恨和怒火往肚里咽。为了不连累家里人，不叫父亲过分伤心，我终于告别了亲人，硬着头皮回富农家。

那富农一家正在到处打听我的下落，见我进门，富农婆就绷着脸恶声问道：“死团仔，你死到哪里去了？”我照着事先想好的话，对她说给人家放牛去。富农婆一听，冷冷一笑，摇着那胖得象猪的身子走了。我不理她，就向厨房走去。富农瞪着眼骂道：“不准你这个死团仔吃饭。”我心想：穷，也要穷得有志气，绝不向你们求乞。我饿着肚子回到猪灶旁睡觉。半夜，那富农和恶婆象疯狗一样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鞭条棍棒象雨点似地落在我身上。直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又连拖带拉把我甩在门外。那恶婆嘴里还不住骂道：“打不死你这个死团仔，就叫你饿死冻死在这里，看你还跑不跑！”我咬紧牙根一声不吭，暗里下了决心：打不死我，我就是再跑。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不顾全身的疼痛，忍着饥饿，冒着刺骨的严寒，在茫茫的黑夜里走

着。要走，就走得远远的。我这个十岁的苦孩子，带着仇和恨，终于逃离了富农家这个鬼魔窟。

这以后，我到处流浪，讨乞度日。后来又给人家打打杂，帮帮工，这样过了七八年，最后来到温州。有一天，一个姓吴的木匠从厦门回温州探亲。他了解了我的处境，非常同情，就对我说：“你这样流浪，生活没个着落，还是跟我到厦门谋生吧。”我想，到别处看看，说不定会比在这里强。

流落异乡 受苦受难

一九二五年腊月除夕，我跟吴木匠到了厦门。一上岸，我一边看到商店酒楼张灯结彩，富人家正在花天酒地地过年，一边却看到街头巷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群衣衫褴褛，脸黄肌瘦的穷苦人，正在痛苦地呻吟着。又想到自己流落异地，孤苦伶仃，心一酸，泪水就滚落下来。

当时，厦门正在修马路。吴木匠曾经在一个修马路的姓陈的工头那里干过活，就带着我找那个工头去。

那工头见我又矮又瘦，先是摇了摇头。吴木匠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塞在工头手里，央求道：“这苦孩子还有力气，你就收下吧。”那工头一见几块明晃晃的大洋，亮了眼，指着一块石夯对我说：“试试看！”我一气，把这百把来斤的石夯举过了头。工头瞪了一眼，这才拉长腔调说道：“这样吧，每天工钱小洋四毛，扣伙食两毛，有做工给钱，

没做工不给钱，伙食还得照扣！”我想也没其他活路，先糊个口再说，便答应下来。就这样，我开始过着“鸡叫出工去，月出回家门，穿的麻袋衣，睡的沙石床，吃的稀米汤，住的四面光”的马路工生活。

半年过去了。有一天，该是发工钱的时候了，工头装着笑脸对我说：“尚贵，你光棍一条，没啥花费的，工钱放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用就来拿。”说完，就走了。以后我向他拿工钱买点东西，他又是推又是拖。到了年底结算工钱的时候，我要他把一年的工钱统统算给我。工头听了，脸色一变，威胁道：“尚贵，你放明白点！当初你进来，我陈某一没拿你的保证金，二没少算你的工钱。今天叫你把钱存在我这里，还不是怕你丢了。为的你好，你还不识相。”我知道他没安好心，就说：“我想把钱寄回家里给年老的父亲。”工头一听，“啪”地往桌上一拍，吼道：“你不想干了，混蛋！”转身就溜走了。我冲过去想抓住他讲理。工人兄弟拉住我，叫我要留意。他们告诉我，这姓陈的工头上通市里的贪官污吏，下面又拉了一帮流氓打手，谁要触犯了他，迟早要遭毒手。前两年有个工人也因为要索回被这工头扣留的工钱，被他叫了一帮流氓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还被开除了。为了糊口，我暂时憋住这口气，可心里恨透了他。

过了不久，工头突然向我们宣布工程要结束了，从明天起就散伙，大家自己找出路。我们就要他结算工钱，姓陈的工头朝天望了一眼，眼珠子一转，说：“天黑了，大家先休息去，明天再来结算。”第二天，我们上他家去，屋里空无

一人。原来这家伙拐骗了我们的工钱连夜带着全家溜了。工人们气得脸都变了色，恨不得把这贼工头抓回来撕个粉碎。

工钱被拐走，又失了业，我只好又当上乞丐流浪乞食。后来，穷哥儿们介绍我向思明东路万湖车店老板租了辆人力车，我就当起人力车夫来了。

谁知刚拉车就出了事儿。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伪警察拿着警棍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说我没绕岗亭走违反交通规则，就把我拉到伪警察局。我对他们说刚拉车不懂得这号规矩，以后不再犯了。伪警局连听都不听，先把我关了三天，最后拿出一张单子，要我贴印花，交铺保，罚款，要不就不放出来。这伙恶棍真是不敲诈勒索就过不了日子。我好不容易东借西凑，才还了伪警察局的帐和车租。这笔债，后来我辛辛苦苦拉了两个多月的人力车，才勉强还清。

没过多久，我又遭到一场横祸，还差点丧了命。

那是夏天的事。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钟，有个身穿黑绸衣，脚穿软底阔口鞋的人来到思明戏院门口，要我给他拉车到大生里。一路上，他拼命蹬脚板催我快跑。到了大生里他又叫我拉到南普陀。快到南普陀的时候，他突然叫我停车，厉声问道：“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我边擦汗边叹着气说：“跑了一天，还不到一块钱。”这家伙听了，伸出手就要我把钱交出来。我说：“这可是血汗钱，交了车租后还要吃饭呵。”这家伙一把抓住我的胸襟，用力把我推了一下，就“嘘”地吹起了口哨。霎时，从附近山坡上跳下了六七个流氓，向我直冲上来，两个架住了我，其他几个有的搜我的

身，有的拆轮胎和车上的帆布。这简直是要我的命。我拚全力挣脱，同他们干起来。可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这伙流氓，没几下，就被他们打昏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捆绑在山口的一株树干上，四周黑沉沉的，一个人也没有。第二天早上，上山拾柴火的人看到我，才给我解开绳索。我顾不得浑身酸痛，忙跑到昨天出事的地方一看，那辆人力车只剩下几片破木板散落在地上。我急得浑身冒火。这旧社会，官匪一家，逼得穷人没法活呀！为了赔车钱，我又到处借债。整整拉了两年的车，才还清这笔冤枉债。

这时，父亲来信说三哥参加游击队，被反动派杀害了，反动派还扬言要满门抄斩，大哥不知去向，他自己年迈体弱，四处流浪，现在已经病得奄奄一息。想到一家人被逼得死的死，散的散，病的病，我满腔仇恨涌心头，恨不得把这鬼世道砸个粉碎！

虎暴狼凶 仇深似海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厦门沦陷了。日本鬼子一上岸，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抗战前几年，我被一家私人诊所雇去拉“家车”，兼做杂务。鬼子快要占领厦门的时候，这家私人诊所的医生便卷着巨款，带着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去。他临走的时候雇我给他看房子。厦门沦陷后的几天，一个汉奸带着鬼子到诊所来

搜查，搜查不出什么东西，鬼子便把我抓走，关在虎头山日本监狱里。这座监狱关满了中国人，许多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抓进来的。他们三天两头受严刑拷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监狱里时时都可以听到中国人被折磨的惨叫声。鬼子逼着我说出诊所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呢。鬼子问不出名堂，就用藤鞭钢条打我，给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每次受刑，我都昏死过去。受了几次刑，我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还大口大口地吐鲜血。

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四周是荒草野冢，远处还传来野狗的吠声。我想，大概是鬼子把我当死人拉出来抛在荒野，让野狗去咬。呸！瞎了眼的狗东西，我不死，我要活，总有一天，我要亲眼看到你们这伙狗强盗的可耻下场！想到这里，我浑身增添了力量。我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挣扎着一步一步往前爬，终于逃出了虎口，摸索到了市区，踉踉跄跄来到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力车夫睡的破房子里。工友们一边给我擦洗着身上的血迹，一边听着我对鬼子的控诉。大家怒睁双眼，捏紧拳头，痛骂残无人性的鬼子。此后一段时间，我在工友们的护理下养伤。工友们轮流给我喂食，四处抓草药给我医治，使我感动得流下热泪。真是天下穷人一家亲啊！

半年后，我身体稍好了些。为了不增加工友们的麻烦和负担，我又出来拉人力车。不久，我在工友弟兄帮助下，和一个从龙海港尾乡流落到厦门来的穷苦人家的女儿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孩子。那阵子，我每天起早摸黑拼命地拉人

力车，妻子给人帮工洗衣服，可还是难以度日，只好挖野菜剥树皮来凑合着糊口。因为长期吃野菜树皮，我妻子整个人都发肿了，小孩子瘦得都没力气哭出声来。日本鬼子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呵！这阶级的深仇民族的大恨，我们是永远也不能忘记呀！

我们就这样在死亡线上穷熬苦挨地度了三年。一九四五年八月，鬼子投降，抗战胜利了。我想这回该过个好日子了。谁知道鬼子的兵舰还没从鹭江消失，那些在抗战期间跑得无影无踪的反动官僚政客却扛着刮民党的破旗在厦门招摇过市，发起劫收财来了。

我还是找不到固定的职业，生活就象海上的浮油桶一样漂泊不定。我几次想到码头上找个活儿干，那些工头一开口就要“保证金”，还要送钱送礼，我哪有法子呢？这时又添了个孩子，日子过不下去，只好忍痛把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送给人家。最后，我带着一家大小逃难到厦门岛对岸南太武山下的港尾乡，寄居在小舅子家里，靠砍柴打杂度日。

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也很不安宁。当时，蒋介石疯狂发动反革命内战，到处派丁拉伕，强征苛捐杂税。港尾乡的伪保长江来程，依仗狗势，借抓丁派款，大肆敲诈勒索，鱼肉穷人。那些交不起捐税派款的穷苦人，就要被抓去当壮丁。反动派抓壮丁真是凶残无道。他们把人用镣铐扣住手脚，再用铁链把许多人串在一起，就象赶牲口一样。谁要是逃跑被抓了回去，就要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杀害。那伪保长江来程见我是外地来的穷鬼，知道榨不出什么油水，就想把我抓

走。有一天半夜里，村里的狗吠得厉害，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急促地喊道，“阿贵，快跑！”我翻下床来，连件衣服也来不及穿好，就从后门越墙逃跑了。这时我看见村口手电光乱闪，一堆黑压压的人群向我家走来，这是伪保长带人来抓我了。我没命地奔跑着，躲进了大山里。大山里有老虎，呆不下去，我又跑到海滩石岩缝里躲起来。这里没东西可吃，我常在夜晚偷偷跑到山上的野庙里拿祭供品吃，有时跑到地里挖地瓜充饥。这时，正是严冬，我只穿一身单薄的衣服，凛冽的海风迎面扑来，象刀子割肉，痛得难受。就这样，我在海边躲了七天七夜。

第八天中午，我发现有只小舢板漂流过海靠在滩上，船上只有一个人，定睛一看，是船老大陈正德。正德也是个穷苦人，靠摇舢板度日。他常过海到这山上砍点柴草回去卖钱凑家用，因为常在一起砍柴，彼此还熟悉。我这时心里升起一线希望：跑过去拉住他到石岩缝里谈心。陈正德很同情我的处境，他想了个办法，把我藏在柴火底下，载回厦门，躲在他家里。

可是，港尾抓丁，厦门也在抓丁。我不愿让陈正德一家为我冒风险，第二天夜里，就跑到厦门的美头山、虎头山，躲进山上的墓窟里。在山上我碰到好多穷苦的青年，他们和我一样，也为了逃丁而离家睡墓窟。这时，快要过年了，那些达官贵人富豪子弟正在大吃大喝寻欢作乐，而我们穷苦人却躺在这阴森可怖的墓窟里和死人做伴，这是什么鬼世道呵！想到这里，我仇如海深，恨比山高。我和许多穷人一

样，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苦尽甜来，早日见太阳。

翻身解放 红心向党

苦难，终于熬到了头；希望，变成了现实。一九四九年十月，厦门解放了！

解放初的一天，我从江头拉板车到市区，上坡时，几位解放军同志立即跑过来帮我推车。我十分惊讶，我活了四十一年，挨过警察的棍棒，受尽日本鬼子的欺压，遭到反动政府的搜查抓捕，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当兵的帮助老百姓。这是碰到什么好世道呵！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帮咱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我从心眼里深深爱上了自己的军队。

这以后，我当上了码头工人。头一个月，就发了工资，当我捧着工资回到家里，我和我的妻子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妻子噙着泪花说：“活到了这般年纪，头发都快白了，才真正看到好日子。”我对妻子说：“苦难的日子过去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哩！”我决心努力工作，报答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

解放初，厦门受到敌人的封锁，为了支援前线保卫国防，我和许多码头工人常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沿阵地给解放军同志运粮食送炮弹。有人对我说：“尚贵，这不是很危险吗？”我说：“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把我折磨死，我都不死。现在为保卫穷苦人的天下和幸福生活，再大的危险我也不

怕！”在支前工作中，在往后的修建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的战斗中，我都拼死拼活地干，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一九五六年五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我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泪如泉涌：我，一个在旧社会被折磨、受侮辱，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做了主人，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天再高，没有毛主席的恩情高；海再深，没有毛主席恩情深。我在毛主席像和党旗面前立下了庄严的誓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人类解放，我愿奋斗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一九六五年，领导上为照顾我的身体，让我退休。我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身体可以退休，思想可不能退休。我坚持参加退休码头工人纠察队，不管黑夜白天，刮风下雨，都坚持站岗巡逻，保卫国家财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懂得要干革命，不能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而要树立自觉的无产阶级立场、思想，要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这就要努力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我年纪大，文化低，学习有许多困难。但我经常听广播、听读报，看不懂的地方就问别人和家里人。我决心活到老，学到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和最近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学好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擦亮眼睛，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

政，以逐步削弱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这样如果再产生林彪一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就能及时识别他们，打倒他们，永保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鹭江码头“散工”恨

——退休码头工人廖菊家史

最近，我又一次看了革命样板戏《海港》。当我看到“壮志凌云”这一场里，退休码头工人马洪亮师傅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和陈列在阶级教育展览馆中的“过山跳”、杠棒、皮鞭……时，我不禁仇恨满腔，泪水盈眶，抑制不止内心的激动：是啊，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上海码头工人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他们的血和泪汇成了浦江潮；那时我们厦门码头工人也同样过着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我们的仇和恨比鹭江水还深呐！这时，我眼前涌现出解放前那一桩桩辛酸的往事……

泪水淹童年

我是福建安溪人。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祖祖辈辈都租种着地主的几块瘦山地，全家一年忙到头，累断了筋骨，过的却是野菜拌糠的生活。每当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地里的野

菜都挖光了，一家人还经常饿肚子。我十二岁那年，家乡碰上了大旱，地里长不出一粒庄稼。地主老财却如狼似虎地催租逼债，土匪又行凶抢劫，逼得穷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许多人只好携老带幼，背井离乡，出外逃荒。我父亲也带着一家老小四口，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了厦门。

旧社会的厦门，是富人享乐的“天堂”，穷人受罪的活地狱。父亲来到厦门，举目无亲，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只好穿街过巷乞讨度日，过着有一顿没三顿的生活。

不久，父亲到一家银器店的老板家去当伙伕。除了给店员们做饭外，还要做老板一家大小十几口人的家务事。白天忙得团团转，夜里还要伺候老板和他的狐群狗党喝酒猜拳，抽烟赌博。直到下半夜，那些老爷阔少玩够了，散场了，父亲才能合一下眼皮，打一个盹。不久又得起来煮早饭了。繁重的劳役，残酷的压榨，使得才四十出头的父亲，不到一年就累得眼花背驼。

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父亲干完一天的活，正想歇息。老板在楼上吆喝了一声，父亲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上楼。走到半楼梯，忽然一阵头晕，踩了个空，摔了下来，当即头破血流，昏了过去。老板见我父亲伤势很重，忙叫人把我父亲抬回家，还说要解雇父亲。母亲气得嘴唇都咬出血来了。第二天，她到店里找老板评理。老板绷着个死人脸冷冷地说：“谁叫他不小小心摔倒？我可管不了！”说完，把我母亲推出来，“砰”的一声就关上了门。

父亲病倒，一家人的生活就没依靠了。可怜那年幼的小

弟，饿得憋不住，整天爬在地上哭叫着要吃东西。母亲愁得眼眶越来越深陷下去。父亲躺在床上呻吟着，不住咬牙骂道：这鬼世道，真不让穷人活下去呵！因为没有钱医治，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久，父亲便含着悲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亲的死给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那时我十四岁了。望着母亲忧愁憔悴的脸庞，看着弟弟枯萎瘦弱的身子，我真想替母亲分担忧愁和痛苦。我就对母亲说：“妈，找个工作给我做吧。”母亲望着我骨瘦如柴的身子，抚摸着我的头，泪水不住地滴在我的脸上。我安慰她说：“妈，我能行！”为了生活，母亲只好带着我四处找工做。后来，一个连脚趾头也会拨拉算盘的木器店老板用最低的代价把我雇去当小奴隶。我除了替老板一家干各种杂事外，还得去锯木头。每天不停地忙上十五、六个钟头，活还干不完。老板和老板娘稍不称意，就拧我的耳朵，打我的耳光，不给饭吃。他们每打我一次，我心里就增添了一分对他们的仇恨。

一天夜里十一点多了，我干完活，正想休息。忽然背后有人猛喝了一声，回头一看，只见老板凶着脸骂道：“小懒鬼！快锯木头去！”我强打精神到了工场，还没跟师傅拉上几下锯子，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眼皮一直撑不开，双手也不听使唤了。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左手象被快刀劈了一下，痛得我叫了起来。睁眼一看，只见左手鲜血淋漓，一截大拇指已经掉在地上。师傅急得把我抱在怀里，大声呼

喊。老板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凶神恶煞地骂道：“别装死赖活，快给我干活！”我当时痛得快昏过去了，只隐隐约约听见师傅气愤地对老板说：“孩子干活顶不住了，锯断了指头，你不送医院，还要叫他再干，安的什么心？”老板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叫人来白吃饭的。不能干活，就给我滚！”明明是老板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夺去了我的手指头，可是黑心的老板不但不给我医，还一脚把我踢开。资本家把我们工人欺压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眼泪，心里只有仇和恨。

血染“鸳鸯跳”

我被狠心的老板赶出来后，就病倒在家里。那只断了指头的手肿得老大，痛得直钻心，又发着高烧，人昏昏沉沉的。我怕母亲伤心，不敢吭声。母亲已经急得都要哭出来了。家里穷得灶门里经常断了火星，又哪来抓药治伤的钱呢？多亏师傅和邻居穷哥儿们帮助，上山采草药给我治伤，我才慢慢好了起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处寻工打零。不久，我在浮屿码头当了“散工”。

浮屿码头的工头，也是个不顾工人死活、敲骨吸髓的家伙，工人们都叫他“黄抽筋”。当时帝国主义和一些富人商贾在厦门大兴土木，黄抽筋巴结反动政府里的官僚政客，揽做了砖瓦红料的生意，钞票一迭迭地落进他的腰包里。他规定要挑他这批砖瓦红料的工人，先得无代价替他把砖瓦红料从船舱里卸到岸上来，等买主买货托运时，才能让你挑运。

买主也是吝啬鬼，他们常常不叫黄抽筋托运，却用更低廉的工钱自己雇工挑运。这样，工人十有七八回是白白给黄抽筋卸货。那时，失业的人到处都是。没法子，工人们只好忍着泪去做工，心里恨透了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一天，我们又给黄抽筋卸砖瓦红料。那东西一件就是两三百斤重，扛在肩头，象是背上一座小山。背着它走在窄小的跳板上，一直摇摇晃晃，颤颤颠颠。那跳板从船上架到码头，高高低低，要转好几个弯，工人们叫它“鸳鸯跳”（闽南话“弯弯跳”的谐音）。我和大伙从清早到中午，扛着沉重的货包，在这“鸳鸯跳”上转来转去，已经又渴又饥，两条腿软得发抖。黄抽筋却拿着拐杖，站在船头督工，还死命地催着我们快干。快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十分吃力地从船舱里扛起一包红料踏上了鸳鸯跳。只走了几步，由于跳板摇晃得厉害，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站在船头的黄抽筋就追了上来，对我大喊一声“快”，又用拐杖往我背上使劲地捅了一下。我一个踉跄，失去平衡，连人带货一起摔到离跳板一丈多的海滩上。那时正好退潮，海滩上净是破砖烂瓦，我摔下去后浑身象给刀刺一样，惨叫了一声，就不省人事了。

工人们见我跌落海滩，忙放下活计，赶过来扶起了我。大家见我血流满地，嘴吐白沫，就抬着我向黄抽筋走去，要他立即送我进医院抢救。黄抽筋歪着脖子就骂：“什么，摔碎了我的东西，没叫他赔，还要我掏钱送他进医院，没那么便宜的事！”工人们一听，气愤不过，大声地责问他：“人都快死了，你不救，还凶什么？”黄抽筋吊起三角眼，冷冷



一笑：“哼！死就死，碍我啥事。死了一百个才五十双。快给我干活！”接着举起拐杖，想驱散工人们。大家气得拳头都捏出汗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住手！看你敢逞凶！”大家立即涌向黄抽筋。他见众怒难犯，便换了一副嘴脸，支吾了几句，说可以先送医院，就夹着尾巴溜走了。

可是当天下午，黄抽筋就翻脸不认帐，还诬蔑我惹了祸，引众闹事，不准我再到浮屿码头做工。我母亲和几个工人兄弟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要找黄抽筋评理去。大伙儿劝住了我们说：那家伙有钱有势，哪里是我们穷人讲理的地方啊！这一次还是靠工人兄弟凑钱给我治病，他们还起早摸黑为我上山采草药。过了好几个月，我的伤才慢慢好起来，但留下了终生的隐疾。此后，每逢阴天下雨，我的腰眼就要作痛。

仇满鹭江潮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鬼子占领了厦门。鬼子一上岸，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还到处放火烧房子。厦门的马路上躺着许多尸体，鹭江的水都染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仇大恨。

这时，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一家七口天天张着嘴要吃饭，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活儿干。我走投无路，只得忍痛卖掉一个孩子。鬼子在厦门残暴无道，穷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许多人都冒着生命危险，暗地里偷渡到厦门对面的鼓浪屿万国租界，希望有一线生路。我也带着一家大小，偷渡到鼓浪屿来。

但是，“万国租界”的鼓浪屿全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根本没有中国穷人立足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夜里只能露宿在挡不住风，遮不了雨的僻静巷道里；白天，我就到处转，寻点零星杂活干。

有一次，一个商人雇我和几个工人挑一批柑桔。为了多挣几个钱，我们同时包挑两担柑桔，先挑走一担歇在半路上再回过头挑第二担。可是当我挑着第二担柑桔走到歇放第一担柑桔的地方时，那担柑桔却不见了。我急得都快疯了。这时路边一个小孩子指着一家朱漆大门，说是那里面的人扛进去的。我马上冲近朱漆大门。里面立即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气势汹汹地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是来找柑桔的。那人不等我说完，就拧起眉毛恶狠狠地嚷道：“你说我偷了你的柑桔？呸！来人啊！”顿时从屋子里冲出几个大汉。那人贼喊抓贼，叫道：“这穷叫化子大白天闯进院子里要偷东西，给我抓起来送工部局。”几个大汉就连拖带推，把我拉到了鼓浪屿工部局。

鼓浪屿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和买办欺压穷人的工具。我看见那个西装革履的人不知用什么话跟工部局里一个洋人叽叽咕咕说了一阵，那洋人便虎着脸朝我走来，二话没说，一连打了我几个耳光。我又气又恨，问道：“为什么打我？”那洋鬼子见我还敢回嘴，气得象疯狗似地哇哇乱叫：“奥普

力，打死你活该！”接着便叫了几个巡捕，把我按在地上，挥起棍棒打了我几十大板，还企图强迫我向这个西装革履的家伙“赔礼认罪”。我不肯，于是又被毒打了一阵，最后被丢在工部局门口。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个鬼世道，穷人走到哪里都是受欺压啊！

我刚咽下了一场冤枉的官司，回到家里，马上又背上一笔冤枉债。那个商人逼上门来，硬把一担柑桔四五块的价钱抬高到十五块大洋，要我赔偿。我穷得口袋见底，哪来这一大笔钱？那商人就叫一个狗腿子整天上门来索钱逼债，还威胁道：“两天内交不出钱来，送工部局问罪。”我们一家给逼得象跳进油锅里一样，受尽熬煎，走投无路。想来想去，除了再卖孩子，没有别的办法了。我那大女儿听我对她妈妈说要卖小弟弟，紧紧抱住妈妈的腿哭着说：“妈，不能卖小弟弟呵！”我们做父母的一听，泪水就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我妻子拉住大女儿的手，抽泣地说道：“孩子，不是爸爸妈妈心狠，是这鬼世道逼的呀！”我们含泪卖了亲生的骨肉。可是，孩子的身价只有十二块大洋，还不够赔一担柑桔钱啊！那商人见我们没钱还清欠款，就强迫我的妻子给他家当奶妈抵债。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猛兽啊！

不久，日本鬼子又占领了鼓浪屿，我们在鼓浪屿更呆不下去了。我只好又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厦门。我向车主租了一辆板车，经常在太古码头和水仙码头一带找活干。

一天下午，太古码头的工头曾大秃子带着几个鬼子兵把我们几个工人抓走，鬼子挺着刺刀押着我们到郊区殿前村拉

杉木。从下午一直干到夜里十点多钟，我才拖着疲劳不堪的身驱走回家。还没到家门口，远远就听到一阵阵凄惨的哭声。出什么事啦？我心里卜卜地跳着，三步并作两步走。啊！我吓呆了，我的家变成了一堆残砖碎瓦，我急得眼泪都滚了出来，大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当我在一堵残墙断壁下找到家人时，母亲扑到我身上，放声痛哭起来。她说鬼子以修工事要木料铁条为借口，下午在这一带强拆了一批民房。这时我向四周扫了一眼，只见周围都是一堆堆断砖破瓦。日本鬼子捣毁了我们的穷人多少住房呵。这一夜，我们这些被鬼子拆毁房子的穷苦人都没合上一眼，大家怀着满腔仇恨，控诉着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暴行。后来，我们一家在穷哥儿们的帮助下，才借到一间房子安顿了下来。

一灾未平一灾又起。几天后，我又遭到汉奸工头曾大秃子的坑害。原来，这家伙一向依仗着鬼子的势力，任意欺凌和敲诈工人。我因为家里穷，没法给他送礼，他就怀恨在心。那天，我正在太古码头扛活，被曾大秃子瞅见了。他鬼头鬼脑地窜到一个鬼子身边嘀咕了一阵，那鬼子就尾随着我。当我把米包放进仓后，这鬼子猛地朝我背上打了一拳。我怒火满腔，心想这狗强盗真是欺人太甚，我今天就跟你拚了。我圆睁着眼，叉开双脚，挥起了拳头。鬼子先是怔了一下，接着就嗷嗷大叫起来。顿时，一群鬼子兵象饿狼一样向我扑了过来。工人兄弟看见鬼子这样欺压人，平时积在胸中的仇恨也并发出来了，纷纷甩下米包，围了上来。码头上乱作一团，鬼子被我们工人打得哇哇直叫。但是，鬼子仗着武

器打伤了我们许多工人，还抓走了好些人。当时我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了。工人兄弟把我抢出来，背回家里。

母亲见我被子打成这样，气愤之下，病倒床上。这时，我那个因生活所迫到郊区给一家富农当雇工的大儿子，也被折磨得患了黄疸病，全身浮肿，被赶回家。一家三代人，在床上辗转呻吟，无钱求医。没几天，我的母亲就含恨离开了人间。接着，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大儿子在痛苦中死去。他死的时候，两眼张得大大的，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象是在愤怒地控诉这吃人的旧社会。真是死不瞑目呵！

祖孙两人相继死去，勉强活下来的人也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家里全靠妻子拣烂瓜菜熬着度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九四五年八月，鬼子投降了。哪知道又来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穷苦人仍然没有好日子过。

我照样租着板车在码头上当“散工”。抗战前，我看到厦门港海面上，停泊着许多英、法的商船；日本鬼子占领厦门期间，鹭江摆满了日本膏药旗的军舰；这回抗战胜利了，可厦鼓海峡到处都是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舰在横冲直闯。我亲眼看到美国水兵上岸酗酒打人，追逐妇女，到处横行霸道，心里真是气愤极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接连遭到失败，经济上全面崩溃，政治上土崩瓦解。他们到处拉伕抓丁，强征暴敛。码头工人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了。为了躲避反动派抓伕抢车，我们曾一连几天不敢出来干活。可是不干活，一家人怎么生活呢？有一天，我和工友林监硬着

头皮拉板车出来找活干。那知一到中山路，就遇上了国民党匪军官。这匪军官走过来大声吼道：“苦力，给老子拉趟东西去！”我知道给这些豺狼拉去，不但要丢车，人也不容易跑出来。就对这匪军官说：“老总，不行呵。一家人都指望着我们呵！”那匪军官见我们不愿走，伸手对准林监的胸口就是一拳。我两眼气得冒火，心里想：国民党反动派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下子，你还敢如此嚣张，今天就给你个颜色看看！于是挥起拳头直往匪军官胸口打去。那匪军官正趾高气扬，没防到这一着，挨了一拳，向后踉跄了几步，还想进行反扑。林监一看，赶快从背后冲过来，对准他的后脑勺又是一拳，匪军官当即被打倒在地。我们两人又围过去揍了他几拳，然后赶紧拉着车子跑走了。

临解放的几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海面，严厉地监视着码头，码头工人大都没活干，码头“散工”要找个活儿就更不容易了。我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穷哥儿们是互相帮助，共同度过难关。大伙儿心里明白：黑夜虽长总有个尽头，苦日子就要过去，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翻身做主人

东方升起红太阳，来了救星毛主席、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厦门解放了。这一天，我们码头工人和广大穷苦的老百姓一起，扛着红旗，排着队伍，敲锣打鼓欢迎毛主席

派来的人民子弟兵。

解放后，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斗争工头恶霸，扫除反动势力，成立了工会。码头回到人民手中，码头工人当家做主人。

一九五三年，领导上提拔我当副中队长，听完这一宣布，我止不住流下了热泪。旧社会，我们码头工人不如路边一棵草，被资本家、工头、反动派踩在脚底下，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今天，党和毛主席对我们这样关心、爱护、培养我们，我怎能不万分兴奋和激动呢？可是，我想：咱是十个指头捏货包，干力气活的大老粗，一字也没划过，从没在大庭广众说过话，管几十个人的活计可是个大事，能挑得动这副担子吗？领导上知道我的心思，到我家串门，亲切地对我说：“寥菊，你说旧社会咱为啥受苦受压？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工头骑在咱工人头上。今天，我们当家做主，还兴叫那伙人来管码头吗？”一句话，说得我心里开了窍。我勇敢地承担起了工作。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要干好工作，就得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得掌握文化。那时，我已经五十四岁了，读书学文化，困难可不小。我想起旧社会的苦难，想起党的培养和工人弟兄的鼓励，劲头就大了。我记忆力差，别人一天识几个字，我一个字就识它几天，总没有记不住的。我走路念，睡前想，还把字抄在纸上、墙上，经常见面。我边学文化，边拿起毛主席的书看，碰上不认得的字，就做记号问人家。读了毛主席的书，对比新旧社会的不同，我慢慢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

想政治觉悟一天天提高。旧社会的折磨，使我得了胃溃疡病，时常发作。但我想起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想起了阶级的委托，就拚着命地干活，有时一连顶两个班，干上十几个钟头，也不觉苦和累。我们中队月月超计划，多次受到上级表扬。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份。我恨不能年轻它三十岁，好为党为社会主义多出力。一九五九年，我胃溃疡突然复发，大量出血，生命垂危。党和政府及时送我进医院手术治疗，出院后还让我继续疗养。不久，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退休，安度幸福的晚年。要是在旧社会，能有这样的事吗？“这新社会，咱们码头工，翻身作主多自豪。生老病死有依靠，共产党毛主席恩比天高。”马洪亮老师傅唱出了我们码头工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无限深情。是啊！千年的苦根是毛主席给我们挖，幸福的甜源是毛主席给我们开。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哪有我们伟大祖国的今天，哪有我们码头工人幸福的今天！我虽然退休了，也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继续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到底！

历尽风霜志不屈

——退休码头工人白文家史

今年八十六岁的退休码头工人、共产党员白文同志，解放前在厦门鼓浪屿的龙头码头前后当了三十多年“苦力”。他的经历，就是当时千万个码头工人悲惨遭遇的一个铁证，也是他们用斗争迎接胜利和解放后当家作主的一篇很好的记录。

家破人亡 血泪斑斑

白文家世代都居住在鼓浪屿。鼓浪屿是厦门市西南方的一个小岛，和厦门只隔着一道几百米宽的海峡——鹭江。它是名闻中外、景色迷人的游览和疗养胜地，可是解放前，这里却是群魔乱舞的“万国租界”，是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买办们的“乐园”，劳动人民的活地狱。白文的祖父、父亲是鹭江上的船工，一年四季，风里飘摇，雨里颠簸，到头来连片土寸瓦都没能留下。到白文这一代，一家十口人，就靠他和哥哥当码头工人、弟弟干点泥水活的微薄收入糊

口。一家人食无隔夜粮，穿无遮身衣。后来因为生活十分困难，哥哥忍痛把大侄女送了人。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厦门岛。日本鬼子所到之处，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劳动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当时，鼓浪屿鹿耳礁有间日本警察署，成天传出皮鞭声、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那时候，墙角下、马路旁，躺着许许多多被饥饿、疾病、拷打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倒毙在路上的人，被用破草席裹着，丢进了垃圾车……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码头工人过的更是非人的生活。天没亮，就得空着肚子赶到码头抢活干；深夜，直到最后一班渡船靠岸之后，才拖着浑身的酸痛回家。在干活中，经常要受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的咒骂、鞭打。有一次，白文跟一群穷工友扛一宗笨重的货物，扛了一包又一包，好不容易，扛到只剩下最后一包了。白文忍着饥饿，咬着牙，正十分吃力地迈动着步子。突然，一声吼叫：“八格牙噜！”紧接着“啪，啪”两个耳光，打得白文差点连人带货一起摔倒。白文定睛一看，旁边站着一个人杀气腾腾的日本宪兵。原来刚才白文因为肩上压着沉重的货包没给他让路，这家伙就突然兽性大发。白文恨不得把肩上的货包朝他砸过去……

干完了牛马活，好不容易赚到几个铜片，还不够买日本鬼子配给的糙米。这种糙米哪里是人吃的，都发霉生虫了，还混杂着许多砂子、蟑螂屎，放到水里会浮起来，一洗就碎成粉末。就是这种米也配给得越来越少，最少时每人每月只两

三斤，后来干脆连两三斤也取消了。穷苦人只能靠挖野菜、捡高丽菜皮、香蕉皮之类充饥。

在这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白文的弟弟当泥水工再也没人雇用了。他不忍心给家里增加负担，便栖身到大宫庙，过着半打零工、半与乞丐为伍的流浪生活。不久哥哥的脚在扛活中被洋行的货包砸伤，资本家和工头就一脚把他踢开。为了养家，他带着伤硬撑着到码头扛散活。由于日晒雨淋，得了痼疾，结果弄成残废，双脚不能动弹。于是，一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白文的肩上，另外靠嫂子帮打点零工凑凑。这样，日子就更难捱下去了。接着一连串的灾难便降临了。

首先，白文衰老的母亲由于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加上大儿子残废，一家人生活濒于绝境的刺激，便一病不起。那时请一次医生要二元美钞，白文一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来的钱请医吃药？白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亲躺在床上发高烧，最后饿得皮包骨地死去。

眼看一家人活不下去了，白文的爱人为了给白文他们分点忧愁，便坐了小船渡海到郊区石美的娘家去，想多少借点粮食回来，度几天日子。当时，日本鬼子为了封锁海面，出动飞机到沿海一带乱炸一通。同时，“盟国”（美国）飞机也到沿海来轰炸日本占领区。过了几天，白文听说他爱人娘家所在的村庄被炸得一塌糊涂，心如火焚，但海面已被封锁，过不去，只能干着急。后来，有人告诉白文，他爱人一家都惨遭横祸，他爱人被炸得连尸首也找不到了。白文望着茫茫大海，欲哭无泪，仇恨的烈火在他胸中猛烈地燃烧！

白文年青力壮的儿子在鼓浪屿也找不到活干，又怕遭到日本鬼子的残害，就跟着难民们逃到禾山、同安一带给地主打杂。可怜他露宿风餐，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没多久就生了水肿病，接着又染上了血吸虫病。最后拖着一个胀得象鼓一样的大肚子让人抬回到鼓浪屿来，不久就含恨死去了。

接着，双脚烂得发黑的白文的哥哥在病痛和饥饿的不断折磨下，也满怀愤恨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白文刚刚吞下泪水，把哭得死去活来的嫂子和侄子们劝住，一个大官庙的乞丐跑来告诉白文：弟弟饿死在大官庙里。……这样，在厦门沦陷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白文就失去了五个亲人。

白文勉强压抑住深沉的悲痛，想把哥哥遗下的年幼的侄儿、侄女抚养成人。但是，祸事又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了。八岁的小侄女为了给家里帮点忙，天天背上跟她差不多高的竹篓到海边捡“水流柴”当柴火烧。有一天，由于饿昏了，一头栽倒在海里，马上被汹涌的海浪卷走了。过了没多久，白文到郊区曾厝垵找活干，十二岁的侄儿跟着别人到曾厝垵找白文，在兵荒马乱之中半途失踪了。白文闻讯从曾厝垵赶回来，连着好几天四出寻找，结果还是石沉大海，不知下落。

白文的嫂子接连受到这样严重的打击，饥饿虚弱的身体更无法支持了，但雇她打杂的那家资本家的姨太太还要逼着她干活，连休息也不让。一天深夜，她泡茶、煮点心伺候资本家的姨太太们打麻将，又劳累又瞌睡，忽然一阵头晕目眩，一锅滚烫的开水浇到脚上，把双脚都烫烂了。她惨叫一

声，当场昏了过去。等她一醒过来，资本家的姨太太破口大骂一通，就把她赶了出来。她咬着牙回到只剩下一个烂棚子的家里。那时，白文又到曾厝垵干活去了，她只得独自躺在一张破草席上，日夜呻吟，连一口水也没得喝。第二天，白文才接到消息，从乡下赶来，走进破棚子，嫂子的身体早已冰凉僵硬了。嫂子，这最后的一个亲人，终于也离开了苦难深重的人间。

白文一家十口人，就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九个，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这阶级深仇、民族大恨，白文永远也忘不了啊！为了报仇雪恨，白文还是顽强地活下去。第二天，他用破草席裹葬了嫂子，离开了鼓浪屿，只身到曾厝垵给人当帮工。

新仇旧恨 备受欺凌

抗战胜利后，白文回到了鼓浪屿码头。没多久，他就发现，世道还是照旧。鼓浪屿仍然是个“万国租界”，海关、银行都让洋人重新给占了。前脚走了日本强盗，后脚跟来了美国豺狼。蒋介石反动政府又巴结上了美帝国主义这个新主子了。码头工人仍然被压在最底层，饱受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派、买办、资本家、工头等的重重压榨。

一天，白文路过泉州路，看见抗战前旧工部局的牌子又高高地挂了起来。“工部局”！这国民党反动派辱国丧权，出卖民族利益的标志！这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肮脏工

具！白文不由得想起了十几年前被平白无故地拘禁在这个地方的往事：

那是抗战以前的事了。当时鼓浪屿有着许多打着“传教”幌子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伙人口口声声“慈善”、“博爱”，却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和无耻透顶的侵略活动。一天，毓德女中的英国女教士王“姑娘”从外地游玩回来，要白文挑行李到“姑娘楼”（鼓浪屿一所专供外国修女居住的别墅）。路上，从她的网袋里跳出一只杯子，摔破了。白文楞了一下，一看，是只普通的杯子，心想：还好，今天的工钱买个杯子赔她，多少还可以剩一点。那知到了“姑娘楼”，王“姑娘”把脸一翻，一口咬定杯子不是打破的，是白文偷回家去。根本不容白文分辩，她一转身打了个电话，叫来了两个“工部局”的印度巡捕，把白文抓到“工部局”去。一个在帝国主义分子面前卑躬屈膝的华籍官员，气势汹汹地审问了白文，折腾了他一番，就把他丢到一间又黑又潮的地下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后来，穷工友们纷纷为白文打抱不平。经过他们的抗议和斗争，白文才被放了出来。不消说，白文的工钱就这样被王“姑娘”赖掉了。

这就是王“姑娘”的“慈善”、“博爱”！这就是帝国主义分子蘸着中国人民血汗写成的“慈善”，是刺刀加《圣经》的“博爱”！……

想到这里，白文不由得再瞪了“工部局”一眼，愤怒地唾了一口水，忿忿地走开。

这时，美帝国主义者仍在无耻地吹嘘对中国人民的所谓“慈善”和“友谊”，可这是什么样的“慈善”和“友谊”啊！在鼓浪屿，瘟神般的美国水兵一上岸，就酗酒打人，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把整个鼓浪屿闹得乌烟瘴气。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讨好主子，把鼓浪屿风景幽美的“椒庄花园”划为专供美军取乐的“盟军游区”，门口挂上了“华人与狗不能进入”的牌子。老百姓一听说美国水兵上岸，就呼儿唤女地关门拴户。而在码头谋生的工人们，就难免遭殃了。

有一次，白文一大清早就给资本家扛米包，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在路边拣几块石头，垒起个土灶熬稀饭。忽然，背后响起一阵鬼叫狼嚎和刺耳的哨声。白文回头一看，原来是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兵，正一摇三晃地走过来。白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这伙美国水兵已冲到他跟前。他们二话没说，就抓起白文干活用的扁担、绳索抛进海里。白文站起来，正想跟他们评理，一个美国兵飞起大皮靴，一脚踢破了白文的沙锅，稀粥溅得满地都是。这时，另一个美国兵逼到白文跟前，眯缝着眼看了他一下，随后转过脸对其他几个鬼子叽哩咕噜了几句；这伙强盗一下子象狼似地扑了上来，两个人把白文双手往两侧用力一拉，白文整个身子一下子就成了个“十”字。他们一人一边，硬拉着白文的手狂转了起来。

白文早饿得肚皮贴脊骨，又劳累了大半天，浑身没一丝儿劲，被这两个鬼子一摆弄，只觉得天旋地转，冷汗如雨。鬼

子兽性发够了，才猛地一放，白文一下子飞出好几米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白文挣扎着，但是爬不起来，只听见这些鬼子兵疯狂地捧腹大笑。那些凑过来看热闹的国民党警察，不仅袖手旁观，还斥骂白文道：“天生的活该，谁叫你不闪开路子！”白文气得咬牙切齿，两个拳头都捏出了汗。他真想冲过去，跟这些狗畜牲拚个死活。而那些美国兽兵还想把白文扔到海里，幸亏许多工友闻讯赶来，这伙豺狼见势不妙，才呼哨一声溜走了。

天黑了，静悄悄的码头回响着鹭江不平的咆哮。白文愤怒地坐在海边，新仇旧恨在他胸中怒涛般地翻滚。这怒涛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猛烈地冲击着这些吃人的旧社会

团结战斗 翻身作主

白文不愿意在鼓浪屿码头呆下去了，他再次来到曾厝垵乡下，给一家姓沈的当帮工，白天种田，晚上就在山寮里的茅棚过夜，日子比在码头好不了多少。

当时的曾厝垵，是党的一个活动据点。地下党组织通过为贫苦农民办夜校等形式，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培养骨干。白文第一次在夜校听到讲革命道理，就被吸引住了，以后就经常到夜校来参加学习。在党的教育下，他渐渐懂得了，为什么我们工人、农民一年忙到头，还是受苦受难，而地主、资本家不劳动却吃好穿好，还可以任意欺压工人、农

民？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这样横行霸道？就因为在这黑暗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这一小撮人勾结在一起，他们掌握了印把子和枪杆子，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解放过好日子。党的教育使白文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白文的身世根底使他找到党就象找到自己的母亲一样幸福和温暖。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第二天，他满怀革命的热情，重回鼓浪屿码头，参加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

白文回到码头，就抓住各种机会，向受苦受难的码头工友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尽管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派密布特务，加紧对工人的监视、迫害和压榨，但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码头工人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和生活的折磨所压倒，而是拧成一股绳，坚决地进行斗争，迎接黎明的到来。

十月初，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解放了厦门附近的乡村，团团地包围了厦门岛，敌人闻风丧胆，准备逃窜。他们到处抓伏抓差，突击抢运东西。白文看到这种情况，便对工友们说：“这伙强盗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现在他们死到临头，却还想抢走我们的人和东西，大家看要怎么办？”工友们听了都非常气愤，大家轰地一下议论了起来：“咱们就象捆螃蟹一样，绑住他们的手脚，叫他们动弹不得。”“对！咱们就来个捉迷藏，同时暗中保护码头、仓库，叫他们一个人也抓不走，一件货也没法运！”……大家想出了许多对付敌

人的办法。

这一天，敌侦缉队长陈玉水和一帮国民党匪军来到码头上想拉伕抓差，那知码头空无一人。那些匪军对着陈玉水嗷嗷直叫，陈玉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地叫来几个打手、工头，到处乱搜，但还是找不到半个码头工人的影子。陈玉水没办法，自己转来转去闹了半天，还是扑了个空。那些匪军臭骂了陈玉水一顿，无可奈何地走了。

几天后，我军的大炮怒吼了，国民党反动派仓惶逃窜。这时，大街小巷，到处都散落着国民党匪军的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白文立即带领着工友上街把敌人丢下的东西收集起来，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保护仓库、码头，等待亲人的到来。

解放的炮声撕碎了笼罩在厦门上空的乌云，码头工人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白文和工友们紧握武器，彻夜守护在龙头码头，迎来了鹭江两岸的黎明。

厦门一解放，白文同志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参加码头上的反霸斗争。翻身做主的白文，虽然已经鬓发花白，却象年青小伙子一样，有着一股火热的激情和使不完的革命干劲。

天变地变人也变。白文，这个在旧社会做牛做马的“苦力”，光荣地出席了厦门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当他在一片春雷般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同首长们坐在一起时，不由得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久久地凝视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无限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苦力’翻身当

了家，全靠您的指引哪！我们码头工人永远记住您的恩情，永远跟着您，把革命的路走到底……”

毛主席指引工人阶级闹革命，毛主席让工人阶级掌大权！解放以来，白文先后当选市历届人民代表，历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总工会鼓浪屿区办事处主任、区搬运站站长、疗养所所长等职务。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总是虚心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不但很好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而且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事，他都尽自己的力量主动地去做，大家都叫他是“闲不住的主任”、“忙不停的站长”。例如在疗养所里，他进了办公室，是所长，办完事，拿起竹帚把，拿起刀、砧，就成了工人、炊事员。他常说：“现在，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给广大劳动人民干活，是给社会主义大厦添砖添瓦，我恨不得把所有的劲都使出来。想一想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委托，我更要抓紧剩下的年头为人民多做点工作。”

今天，白文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他早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然而，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阶级责任。他想，自己虽然行动不便，至少还有一张嘴可以为党工作。每逢年青人前来访问他老人家的时候，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大家讲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和在新社会翻身做主人的幸福，教育青年们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并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滔天罪行。他愤慨地说：“我们码头工人

受够了旧社会的苦，受够了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压榨，林彪妄想把我们再拉回到旧社会，使鼓浪屿再变成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霸道的地方，我们码头工人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他要求青年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持防修、反修的斗争，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革命，为保卫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江山，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

刘师傅年夜忆苦

——码头工人刘立锭家史

一九六九年的农历除夕。码头工人刘立锭家里，充满着欢乐的气氛。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团聚在一起，吃一顿特别有意义的年夜饭。原来刘立锭的大儿子刘永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二儿子刘永韩是应届初中毕业生，他俩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首批上山下乡，得到了批准，过了春节就要走了。这一顿年夜饭，用刘师傅的话说，也是对他俩的欢送宴会哩！

吃过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边，弟兄俩畅谈着远大的理想和前程，小妹妹刘爱英跟着收音机播送出的欢乐的曲调，高兴地唱起歌来。刘立锭望着孩子们幸福的笑脸，心里乐滋滋的。过了一会，收音机转播《白毛女》的唱段：“躲债七天回家来，地主逼债似虎狼，满腔仇恨我牢记心头……”刘立锭听着听着，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看了一眼周围的孩子，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生在新社会，才有可能过这样欢乐的年夜；在旧社会，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永峰和永韩，你们快下

乡了，应该好好地跟你们讲一讲咱们家解放前所受的苦。……你们应当牢牢记住我们老一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下乡后遇到风浪才会站稳脚跟，遇到困难才能知难而进，干革命、搞建设才会艰苦奋斗。要是想舒舒服服地‘干革命’，那只能是国家变色人变修，我们又要回到旧社会那种苦日子去，哪能象今天这样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围在一起过年啊！”

接着，刘师傅讲述了他在旧社会三十六年的血泪史。

* * *

咱们家在广东省潮安县横溪村，家无寸土，我父亲——你们的祖父——给地主扛长工。他流尽血汗，却养活不了一家人，还背上一身阎王债。记得我八岁那年旧历年三十，地主狗腿子带着几个打手上门逼债。父亲早就出外躲债去了，这些家伙在家里乱翻了一通，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最后把正在孵蛋的一只母鸡和几个鸡蛋也抢走了。这天夜里，天气特别冷，我们兄妹四人在破房子里蜷缩成一团，母亲端上一碗地瓜汤，一碗萝卜汤，这就是全家人的年夜饭了。

往后的日子就更艰难了。别说吃不上地瓜，连野菜也难找了。一家人只能拣青金树叶、剥树皮吃。那是一九二七年。这一年有多少灾难降临到我家呀！四月间，父亲没日没夜地给地主干活，家里还经常揭不开锅。身体极端衰弱的母亲饱受生活的折磨，在一个深夜里竟悄悄地含恨离开了苦难的人间。劳累不堪的父亲在母亲的死的刺激下，也患了重病，经常大口大口地咳血。但他还是硬撑着去干活。他白天干完了田里的活，还得上山替地主割做蓝靛染料的山青草，挑到

地主的染坊里来加工，直干到深夜，才精疲力竭地一步步捱回家。到了下半夜三四点，又得去地主的染坊舂山青草。草舂烂了，把草渣挑到田里施肥，接着再干地里的活。这样，一天往往得干上十八九个小时。没几个月的时间，重病的父亲竟被狠心的地主逼得活活累死了。

父亲死得多么惨呀！那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呀！那是农历八月十五，天没亮，父亲连声的咳嗽把我惊醒了。我见父亲摇摇晃晃地出门去，赶快下床来，把父亲留给我们四个兄妹当一天食物的一块树皮饼从锅里拿起来，出门追上父亲，把它塞在父亲的衣兜里。

黄昏时，我们兄妹四人在门口等着父亲回来。忽然远远看到几个和父亲一起干活的长工抬着一个人匆匆地朝我们家走来。我们迎上去一看，啊！抬的正是父亲！父亲的脸色象纸一样惨白，嘴角边有一道殷红的血迹。长工们说，刚才父亲干完了地里的活，已经累得走不动了，狗地主还逼着他上山割草。结果在上山坡时，父亲一阵猛烈的咳嗽，血大口大口地吐了出来。接着，只见他双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大家赶忙把他抬回来。

长工们把父亲抬进屋里，我们赶紧把他扶上床。父亲慢慢地张开眼睛，望着我们兄妹，从衣兜里摸出那块树皮饼，用颤抖着手把它掰成四小块，给我们兄妹每人一块，然后把我们的兄妹紧紧地搂在胸前，断断续续地说：“孩子，爹怕活不下去了，都是这鬼世道给害的呀！是狗地主逼得咱没法活了。你们要……要……”话没说完，手一摊，就咽气

了。我们兄妹四个扑在父亲身上大哭起来。凄惨的哭声，带着我们满腔的仇恨，控诉着地主狗豺狼，控诉着这吃人的旧社会，这血海深仇我永远也忘不了。

父亲的尸体停放了好几天，还没法收埋。我们四兄妹最小的才七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岁，有什么办法呢！在乡亲们的劝说下，只好把两个妹妹卖掉。买主来拉人那天，两个小妹妹哭着不愿走，我也心如刀割。旧社会把我们兄妹活活给拆散了。

收埋了父亲之后，哥哥决定流浪到外地谋生。在村头的大榕树下，兄弟俩抱头痛哭。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哥哥一面。我哥哥名叫刘立舒，以后听人家说，他流落到厦门，不久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四十多年来渺无音信。

几天时间里，我一家人被逼得死的死，卖的卖，走的走，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满腔的仇，无边的恨！我抬头仰望，天，是黑沉沉的天，哪一天才能见到太阳啊！

我找不到活路，只好到一个姓陈的地主家当放牛娃。我整天象牛马一样忙个不停，地主不仅不给半文工钱，连三餐也不给吃饱，还经常恶骂毒打。那年旧历年三十，地主家杀猪宰鹅，花天酒地地过年，我只得到一碗从桌上扫下来的残羹剩饭。我受不了这样的凌辱，一气之下，就把这碗“年夜饭”倒掉。深夜，我躺在牛棚的稻草堆里，想起了死去的爹娘，想起了流落在外的哥哥，想起了被卖掉的两个小妹妹，辛酸的泪水湿透了稻草。

大年初一，我得不到一天的休息，地主逼着我到城里挑

大粪。我思念着卖到城里的两个妹妹，沿街打听，终于问明了她们的下落。我先找到小妹，原来她卖到一个姓张的国民党官僚家里。她一见我，就扑到我怀里痛哭。她说：“阿哥，带我回家吧！这屋里的人比老虎还凶呀！”家！哪里是我的家呀！我只有紧紧地把小妹抱在怀里。哭声被屋里的人听到了，出来了几个如狼似虎的狗腿子，把小妹从我的怀里抢了去。我再也见不到小妹了，可耳边一直回响着小妹那凄惨的哭声，声声撕裂着我的心。

我又找到了大妹，大妹是卖给一个开金银纸（迷信纸）商行的老板。她一见到我，只叫了一声“阿哥”，就咽住了，泪水象泉水般涌出来。听着大妹哭诉被资本家折磨的苦难，真是字字血，声声泪。那狠心的资本家，逼着九岁的大妹天没亮就起来生火烧饭，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多，没有一天不挨鞭抽棒打。有一天深夜，大妹服侍资本家少奶奶的时候，由于过分困倦，打破了一只茶杯。那少奶奶象只母夜叉，拳打脚踢把大妹毒打了一顿。那资本家更凶残，把大妹拖到大门边，将她的小手按在两扇门板的中间，然后用力把两扇门板关上，大妹的四个手指立即被轧断。……听着大妹的血泪控诉，望着她那用破布包裹着的血肉模糊的小手，我恨不得把这些吃人的妖魔鬼怪撕个粉碎！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家伙来到我面前，这就是残害我大妹的狗豺狼。我愤怒地责问他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妹妹。那家伙狰狞地冷笑一声：“人是我用钱买的，要打要骂由我，管你什么事！”说着就把大妹拉

走。我赶忙上前拉住大妹。这时屋里又跑出来一个狗腿子，狠狠地把我推开，将大妹拖进屋去，砰的一声，两扇漆黑的大门关上了。我紧握着双拳，拚命擂打这黑沉沉的大门。我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仇恨。总有一天，这仇恨的怒火，要烧进这些黑暗的大门，把这些狗豺狼烧个焦头烂额，把这万恶的旧世界烧个干干净净！

我给那个姓陈的地主当牛做马，干了整整七个年头，我已经十九岁了。一天深夜，老长工张得力偷偷告诉我说，地主跟伪联保主任串通一气，要抓我去当壮丁，劝我赶快跑，他还把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一块大洋送给我。这阶级的深情使我感激得泪水夺眶而出。就在这天夜里，我逃出了地主的虎口。经过一个多月的流浪讨乞生活，我从广东流落到厦门。

到了厦门，我靠年青有点力气，就上码头卖苦力。当时厦门的每个码头，都有一个工头控制着。这些工头又是封建把头，只有跟工头同姓的宗族人才能进他控制的码头做工，不同姓的人得把姓改掉。同时，要进码头做工都得先给工头送礼买“工份”。踏进码头的第一天，还得通过所谓“考工”。这一天资本家、工头逼着我们这些要到码头上做工的人连续不停地扛一百包大米，能扛完的才算“合格”。这些大米每包重二百斤，要从船舱上肩，走过“鸳鸯跳”（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跳板），登上三十六层阶梯到达岸上，再爬上四十二层阶梯到达太古栈房，最后还要再上栈房里架设的跳板，把米包堆送上去。有些工人因为受饥饿的折磨，扛到中途就累得腰弯腿软，摔倒在地，甚至受伤吐血。工头却说

他们“考工”不“合格”，把他们一脚踢了出来。不但白白给资本家干了活，还落得个浑身伤痛。

我算是侥幸过了“考工”关，但这碗苦力饭还不一定能吃得上。每天天没亮就得到码头路边去排长蛇队，等工头发工签。拿不到工签，就没法干活。就是拿到了工签，干了一天苦力活，挣了几个铜板，也只能过着“蛭干吃，虾米睡”的生活：吃饭的时候，到小饭摊里买碗稀粥，两条腿站着胡乱吞下肚，这不活象只“蛭干”吗？夜里，睡在人行道上、马路边上，身上盖条码头上捡来的破草袋，寒冬腊月，身子卷缩成一团，跟“虾米”一样。这样的苦日子，我整整熬了十四年。这十四年可真不容易熬过啊，有好几回我还差点送了命。

有一回，那是一九三八年，日寇占领了厦门，厦门人民身受法西斯强盗的残害和压迫。一天，东亚码头停靠着一艘日轮“香港丸”号，船上堆满了一包包大米和一箱箱杂货。大工头纪冬逼着我们二十几个工人下到船舱起货。我们一下船，码头上的铁门就关上了，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手提棍棒的鬼子兵。货没起完，鬼子不准我们出码头。

我们连续干了几天几夜，又饿又累。有一位在甲板上负责指挥吊杆的工人，由于太困了，身子一摇晃，被吊臂勾头狠狠碰了一下，一头就栽落到海里。我一见，喊了：“快救人哪！”就和几位工人往甲板上冲去。船上的鬼子兵把我们拦住，一个鬼子兵小头目嚎叫着：“干活的去，不干活通通打死。”大工头也跟在鬼子屁股后面帮腔说：“掉下个把人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干活去，别窝工了！”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我们不顾一切，继续往甲板上冲去。这时，鬼子兵小头目吹起哨子，一伙鬼子兵冲上来把我们团团围住。鬼子手上的棍子象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工人们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一个个扑倒在甲板上。我也被打得昏死过去。鬼子把我们这些昏死过去的人扔在马路边，幸亏码头上的工人兄弟把我们救了回来。那落海的工人，带着未报的冤仇，尸沉大海。这民族的大恨，就象那鹭江滚滚的怒涛，多少年来在我的心中不停地翻滚！

再一回，那已是厦门临近解放的时候了。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福州市，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龟缩在厦门岛的蒋匪军，慌忙地准备逃跑，反动军警在码头上到处抓伕。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我和十一位码头工人被国民党军警抓到沙埔尾，然后用炮艇运到海中间的一只大货船上。船上戒备森严，甲板上，船舱里，布满了国民党匪兵。这批强盗逼着我们从大船上把那堆积如山的箱子一个个搬到炮艇上去。因为大船航速慢，这些家伙想换乘炮艇赶快逃命。这些箱子十分沉重，我们发现原来里面装的都是白银、金条。这些国民党反动派临到穷途末路还要把他们长期搜括的大批财富通通劫走。这一箱箱白银、金条分明是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我们恨透了这些吃人的家伙，就想尽办法磨洋工，同时千方百计地找机会逃跑。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大船上的箱子还象座小山那样，急得国民党匪军象热锅上的蚂蚁。解放军的隆隆炮声，

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这些豺狼的狗命不长了，我们日日盼、夜夜盼的日子就要来到了；焦急的是船上的匪军监视得很严，船的四周又是茫茫大海，我们赤手空拳掉在虎口里，如何脱身。我们知道，当这些箱子一搬完，豺狼不是把我们干掉以便灭口，就是把我们抓到金门、台湾去，让我们继续做他们的奴隶。好在我们十几个人都会游泳，大家偷偷商量好，决定趁夜晚下海，逃离这虎狼窝。

第二天半夜里，四周黑沉沉的，我们趁甲板上放哨的国民党兵正在打盹，就关掉了船舱里的灯，悄悄地下了海。这时正巧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小渔船经过，我们赶紧轻轻地游了过去。那只小船上只有一个老大伯，我们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对我们非常同情。原来这老大伯是一个贫苦的渔民，他的小船也是被国民党匪军抓去替他们运东西的，渔民大伯趁黑夜划着小船逃出来。我们上了小船，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帮着渔民大伯使劲摇橹，有的从船上找来几块木板当桨用，拚命划水，加快船的速度。小船载着十三个同患难的受苦人，在夜色掩护下，飞快地离开了那只大货船。这时已是下半夜了，天空依然是漆黑的，但大家知道，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安全地回到了家里，两天后，厦门就解放了。漫长的黑夜过去了，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

* * *

刘师傅讲完了三十六年的血泪史，望着眼里噙着泪花的孩子们，接着说：“旧社会，咱一家被逼得家破人亡，只剩

下我一个人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全靠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剥削阶级，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结束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日子。今天我能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你们现在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这可是最大的幸福啊！你们要好好干，绝不能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啊！”

永峰和永韩听了父亲的讲述，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表示：“不忘老一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坚决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道路，一定要在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努力锻炼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春节后，刘永峰、刘永韩先后背起行装，意气风发地奔赴农村。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厦门知识青年一样，生气勃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把壮丽的青春贡献给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狠批林彪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的黑货，狠批林彪反党集团诬蔑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无耻谰言，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青年的光辉大道。刘永峰于一九七〇年由贫下中农推荐，选送到当时的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煤矿新兵。刘永韩立志扎根农村，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继续英勇奋战。一代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不忘阶级苦 红心永向党

——退休码头工人蔡洪家史

我们访问了厦门市退休码头工人蔡洪，请他谈谈解放前后的生活。蔡洪首先激动地谈起了一九七三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福建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的情景，并且对比了他十八岁那年，第一次从老家来到福州的痛苦遭遇。这在蔡洪脑海中，是一个永不磨灭的鲜明对照啊！难怪蔡洪在工代会分组会议上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时，是那样满怀激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工人和劳动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再过旧社会那样的苦日子，这是白日作梦！我人虽然退休了，但心永远也不会退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原来，蔡洪十八岁那年到福州时，过的竟是讨乞的生活啊！蔡洪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苦，还得从他悲惨的童年谈起。

童年当长工 阶级仇恨重

蔡洪的老家在闽东北的福鼎县。家中田无一丘，树无一株，只有两间小破房，冬天透风，雨天漏水。父亲租种了地主的几亩田，缴了租子就养不活一家四口人。蔡洪五岁那年，母亲连饿带病死去了，小妹妹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八岁那年，父亲欠了地主的债没法还，农历除夕，地主带着狗腿子来到蔡洪家里逼债，把他父亲打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父亲气恨交加，一病不起，不久就撇下蔡洪含恨死去。

蔡洪成了孤儿后，一个富农把蔡洪带回家当小长工使唤，要他每天一早起来就洗痰盂、倒马桶、挑水、劈柴，然后放两头大牛一头小牛，放完牛还得割一担草挑回家。蔡洪整天忙个不停，富农和富农婆还经常借故打骂他，不让他吃饭。

村里地主富农家的孩子，见老富农作践蔡洪，也都来欺侮他。一天，他们在村口见蔡洪放牛回来，就恶意地大叫：“小杂种来了！小杂种来了！”接着，就是一阵狂笑，随着笑声，泥团和石块纷纷向蔡洪身上飞来。蔡洪忍无可忍，就迎上前问：“你们骂谁？谁是杂种？”这帮孩子仗着父母的权势蛮横地说：“就是骂你，怎么样？”一面动手就打。蔡洪毫不示弱，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本来破烂不堪的衣服，经过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更撕得拖一片挂一块了，辛辛苦苦割的一担草也倒了一地。



这帮财主家的孩子们打了蔡洪，又跑到富农面前来告状，富农见了蔡洪举起大竹片就是一顿毒打，打完又不许他吃饭。蔡洪已经饿了一天，实在受不了，就到厨房去看看有没有可吃的东西。谁知前脚刚跨进去，就被富农从背后一把拉了出来，又挨了一顿打，直被打得昏迷在地上。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蔡洪才从一阵阵疼痛中醒了过来，咬着牙爬回了又冷又湿的牛栏。

蔡洪被折磨病了，面黄肌瘦肚子大，连续几天发高烧，经常昏昏沉沉。狠心的富农见了，连口水也不给他喝，还骂他偷懒装病。邻近一个和蔡洪常在一起放牛的孩子，两三天没见到蔡洪，就关心地跑来探望。见蔡洪病成这样，忙回家告诉他父亲。阶级兄弟心连心，父子俩给蔡洪送开水、熬草药，使蔡洪感激得热泪直流。在阶级亲人的关怀下，蔡洪终于战胜了病魔，渐渐地好了。

十六岁上，蔡洪到邻村一个地主家去当长工，讲好每年年终给两元钱工钱。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地主也动不动就打骂蔡洪。一天，蔡洪送饭到田里，看到一个长工因为累了在田头稍歇一下，就被狗地主打得半死。蔡洪看不过，和大家一起上前责问地主。狗地主见众怒难犯，才不得不停了手。可是，从此他把蔡洪看做眼中钉。

转眼到了这年的农历除夕。地主一家团团坐了一桌在大吃大喝，蔡洪却刚施完肥从田里回来。狗地主一见蔡洪就说：“今天给你算清了工钱你就走吧。有一天你没有出去放牛，应该扣去一元钱。”说着，就把一元钱扔了过来。蔡洪

一想：那是一个大雨天，他因为没有蓑衣，也没有替换的衣服，所以没有把牛放出去，就在家里喂，可也没有把牛饿着呀！狠心的地主竟把它当作一种罪名，扣去了全年工资的一半，真是刻毒到家了。

从童年、少年到青年，蔡洪的血汗全洒在地主、富农的土地上了，换来的却是饥饿和辱骂，还有就是累累的伤痕和满腔的仇恨。

蔡洪被地主赶出来后，找不到安身的地方。这时听人说厦门地方大，找工作比较容易，他想：这里虽然是故乡，可是自己一无父母，二无可靠的亲友，而且无房无地无工做，看来也只能出去了。尤其是想到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蔡洪更是满腔怒火，他再也不愿替这些魔鬼们当牛做马了，于是决定到厦门去闯一闯。

蔡洪搭了熟人的一条便船到了福州。可是身无分文，所以一到福州就只得沿街讨乞，但有时候一文钱也讨不到，还要受到白眼和辱骂。一个年青人，谁愿意去讨乞？这完全是旧社会给逼的啊！

每当想起这些，蔡洪的泪水就止不住在眼眶中转。谁能想到，当年行乞的孤儿，今天竟能作为一个光荣的工人代表来到了福州！蔡洪感慨万千地说：“真是两个社会两个天！”

苦力和奴隶 灾难永无底

蔡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到了厦门。一上码头，他就发



愁了：我是个穷光蛋，人地生疏，到哪里去找活计呢？他焦急地在街头徘徊起来。

天黑了，蔡洪茫然地来到码头边的海后路。这时，一群群疲劳不堪的码头工人陆陆续续来到这里，铺开破草席，放下烂麻袋，坐了下来。一个姓卞的青年工人看见蔡洪一个人呆呆地站着发愁，就主动过来跟他攀谈。他了解了蔡洪的情况后，十分同情，就热情地腾出一块地方，让蔡洪躺下休息，还把仅有的两条破麻袋递了一条给蔡洪，说：“这是‘被子’，晚上盖着，别着凉了。”阶级兄弟的关怀，象一股暖流通过了蔡洪的全身。

第二天，蔡洪跟着小卞上码头找活干。从此，他就当上了码头工人中最苦的散工，在海后路旁安了“家”。散工经常找不到活干，就是能干上一些零星活，也被工头、二手们层层克扣工钱，加上拖延发工钱，往往干了几天，还拿不到一个铜板。

蔡洪在从福州到厦门的船上因为没钱买船票，被查票的剥掉衣服着了凉，所以一到厦门就害了寒热病。为了糊口，他只得带病干活。那是到厦门后的第四天，蔡洪带病去扛豆饼。每块豆饼重五十斤，每次要扛六块，扛少了工头就不让干。蔡洪和别的工人一样，把三百斤重的一迭豆饼扛在肩上，压得双腿发战，虚汗直冒，也只得咬牙拚命顶着。可是已经发了几天烧，又没填饱肚子，蔡洪终于顶不住了，身子一晃，豆饼从肩上落下来，猛地砸在左小腿上，砸得鲜血直流。工人兄弟们一见，纷纷围了上来，有的骂工头心狠毒，

有的提出要工头马上把这几天的工钱算给蔡洪买药治伤。这时，工头吴矮子见围了一堆人，就走了过来。他一面吆喝大家干活去，一面冲着蔡洪恶狠狠地骂道：“你快给我把豆饼扛过去，不要磨洋工！不会干活就给我滚！”工人们气炸了，纷纷磨拳擦掌，要揍吴矮子。吴矮子一看情况不妙，迈开矮腿就溜，一边走还一边骂：“耽误了干活，不开除他已经算便宜了，还想马上就要工钱，没那么好的事！”

工人们把蔡洪抬回了海后路的马路旁。到了下一天，蔡洪病更重了，腿也肿得不能动弹，身上感到一阵寒，一阵热，只好用破草席、破麻袋裹住全身静静躺着。一会儿，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走了过来，用警棍捅捅破草席，见没有动静，又用脚踢了踢。蔡洪迷糊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就努力睁开双眼。当他看清楚原来是个警察，立即厌恶地又闭上了眼睛。那警察忽见蔡洪眼睛一动，吓得急忙后退了两步：“哎呀，我还以为你死了！”说罢，就对蔡洪吼叫起来：“活着就快滚起来，大白天能在马路旁睡觉吗？”见蔡洪不理他，又骂道：“你不起来，看等下把你当死人抬去扔了。”蔡洪满腔愤怒：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多少穷人活着被当成死人哪！

蔡洪在穷兄弟们的帮助下，又一次战胜了病魔，腿伤也渐渐好了起来。但从此以后，一遇到阴雨天，左腿就隐隐作痛。旧社会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病根。

苦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码头工人的灾难还没个完。

一天，蔡洪扛的是每包三百多斤重的黄花菜，要送到楼

上的仓库里去。接连上下几次后，蔡洪累得一身大汗，头昏眼花，最后，连人带包从楼上滚了下来。狠心的工头见了，竟上来对倒在地上的蔡洪又踢又骂：“没用的东西，你还想做搬运？”蔡洪耳里听着骂，身上挨着踢，久久地埋藏在心头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他一使劲就从地上爬了起来，愤愤地离开了十年来日夜在这里流血流汗的码头。

离开码头后，蔡洪到过曾厝垵给地主当长工，后来又到处浪屿和记码头挑土炭，但伴随着蔡洪的，仍然是三天两头挨臭骂，三天两日腹内空。这时，鼓浪屿“大都会”舞厅葡萄牙籍的老板，正在物色一个年轻力壮的工人，码头上的工头、二手们，见蔡洪身骨高大，又有力气，他们为了讨好这个老板，不管蔡洪愿意不愿意，硬把蔡洪叫到了老板的家里。

这个老板，胖得象肥猪，体重二百八十八磅，因为下肢瘫痪，行走不便，就雇了蔡洪和另外两名工人供自己使唤。蔡洪每天除了替他抬轿子外，还要给他洗地板，洗尿盆，背他上下楼；天气热了，还要一天三次背他到海边沙滩上，替他放好救生圈，让他泡在海水里，直到他泡够了，再把他背回家，然后用自来水给他冲身子，擦干；他躺到藤椅里后，还要蔡洪沏好凉茶，给他打扇；……总之，一天到晚，一会儿也不许蔡洪离开他，一离开，他就直着嗓子叫唤，如果答应得慢一点儿，他就拿起一根一米多长的特制的棍子毒打蔡洪。

这老板真不把工人当人，他只顾自己赚钱、享乐，完全

不顾工人的死活。每次外轮来了，老板都要蔡洪他们把他抬到码头上去招徕生意。有一次，一个冬天的清晨，太古码头有一艘英轮靠岸了，老板立即叫蔡洪和另外两个工人把他抬到码头去。接着又叫蔡洪把他背进船舱里，然后叫蔡洪他们在码头外等候，不准离开。谁知道这个老板在船上和船长、大副等又打扑克又喝酒，从早晨六点一直闹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蔡洪他们在码头外整整挨了一天饿，受了一天冻，老板连问也不问一声。老板又经常晚上上舞厅作乐，蔡洪他们也得在外面等候，直到凌晨两三点钟。蔡洪由于长期睡眠不足，眼睛熬得又红又肿，老板连休息也不让他休息。蔡洪和其他工人头发长了，要去理发，向老板请假，他不准；过一些时候又去请假，还是不准；直到第五次去请假，头发已长得实在不象样了，才答应他们去理，可是还规定不得超过半个小时。蔡洪这样日夜辛苦，每个月只得到六元钱的所谓“工资”，而被老板骗来的舞女，一个钟头就能为老板赚五元钱。舞女们要是哪一天没有为老板赚钱，也和蔡洪一样要遭到老板的毒打。

蔡洪受尽了老板的奴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天，他偷偷地跑了出来。可是这个老板，依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发现蔡洪逃跑，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局，蔡洪刚到厦门，警察就把他抓了回去。

蔡洪被抓回去后，老板就更残酷地折磨他，一刻不停地使唤，打骂更是家常便饭。蔡洪心里恨极了，有时背着他，巴不得把他摔在地上，就故意重重地把他往下放，有时听

到叫唤也装作没有听见；有时还故意把老板的东西摔破。蔡洪越来越不听使唤，老板的毒打恶骂也无济于事。老板气得哇哇叫，但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另找别人，蔡洪这才离开了这个人间的活地狱。

天地虽大，可何处是穷人的立足之地？蔡洪好不容易从洋老板那里跑了出来，立刻又被新的忧愁所笼罩了：到哪里去呢？明知码头散工苦，却又不得不再回到码头上。

日寇豺狼性 工人骨头硬

这是一九四〇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厦门已经两年了。鬼子到处布岗放哨，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厦门人民惨遭屠杀、活活饿死的不计其数，码头工人更是身受空前残酷的奴役和迫害。

一天，日本鬼子逼着码头工人搬运一批杉木。蔡洪在搬运中，把一根杉木掉在地上，碰裂了一条缝。这下子可急坏了那个汉奸工头猴冬，他跳过来横眉竖目地指着蔡洪破口大骂：“这是皇军的军用物资，你是有意破坏！”他硬给蔡洪扣上“通敌”的罪名，还叫来一帮爪牙要把蔡洪抓到海后路日本洋行去。蔡洪忍无可忍，就大声质问猴冬：“谁是敌人？谁通敌？大家心里清楚，让大家说说，我通什么敌人了？”猴冬一听，猴脸立时紫涨了起来，一面怒骂着，一面指使爪牙把蔡洪强行拉走了。

在日本洋行里，一群野兽似的日本特务，手拿刑具凶狠

地逼问蔡洪：

“你和什么人联络？谁指使你搞破坏？”

“我天天在码头上干活，一天忙到晚还不够填饱肚子，哪有时间去管别的？什么联络不联络，我不知道！”蔡洪镇静地回答着。

“狡猾狡猾的，说！你的谁指使的？”

“我干活是猴冬指使的呀。”

鬼子又气又恨，兽性大发，对蔡洪下了毒手：他们在井水里掺上汽油，用橡皮管插入蔡洪的鼻孔，一连灌了两瓶，把蔡洪折磨得死去活来。蔡洪头脑昏沉沉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但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念：在法西斯狗强盗面前，作为一个中国工人，决不能屈服！不管鬼子怎样拷打，他都不求饶。面对这样一个硬汉子，豺狼成性的法西斯暴徒也感到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把蔡洪释放出来。

法西斯强盗的迫害，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仇恨，除此之外，他们又能得到什么？

一天下午，三点多钟了，蔡洪和几个工人又被迫去给鬼子搬运带鱼。他们从无数次亲身经历中知道，每次给鬼子干活，不论干多长时间，活不干完鬼子就不让休息，干完了也不给工钱。大家边搬鱼边悄悄地商量：这次不能再替鬼子白干活了，要拿鱼抵工钱。于是，各人在车厢里都拿了一些鱼藏好，蔡洪也拿了四条带鱼卷在腰带里。

汽车到东亚码头停住了。这是鬼子的军用码头，工人们不能进去，就在外面卸车。糟了，蔡洪跳车时一不小心，一

条鱼尾巴从破腰带里露了出来，偏偏被一个鬼子兵看见了：

“拿鱼的有，死了死了的！”鬼子一叫，工人们呼拉一声齐跑了，蔡洪慢了一步，被那个鬼子抓住了。另一个鬼子呲牙咧嘴地对蔡洪骂着，突然一脚横扫过来，蔡洪没防备，一下被踢倒在地上，两个鬼子立刻举起粗棍子朝蔡洪乱打。汉奸工头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活该！”蔡洪咬着牙怒视着工头，工头不由得退了两步，躲到一边去了。鬼子把蔡洪打得昏死过去，方才住手。他们发出一阵狼嚎似的怪笑声，又把蔡洪往马路边踢了两脚，就和工头一起摇摇摆摆地进门去了。

蔡洪醒来时，天已黑了。他发现自己躺在离东亚码头不远的马路边，一位老工人正端着一碗开水，一口一口地喂自己喝。

“大伯，……”蔡洪的眼睛湿润了，想坐起来。

老工人急忙扶住了他：“别动，再躺一会儿吧。”说着，放下碗，用自己的衣角细心地抹去蔡洪脸上身上的血迹和泥土，一边气愤地骂道：“这些狗杂种，竟这样欺侮我们中国人！”

蔡洪紧紧拉着老工人的手：“大伯，我好了些，你也该回家了。”

老工人扶起蔡洪在墙上靠着：“不要紧，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真是穷人帮穷人，阶级情意深哪！蔡洪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老工人执意要送蔡洪回家，可是蔡洪的家又在哪儿

呢？蔡洪好不容易才把老工人劝走。可惜，他竟忘了问一问老工人的姓名和住址。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该回“家”了。可是，走一步，全身就象刀子在乱割。他向东亚码头望去，只见那里有盏昏暗的灯象鬼火似地在一闪一闪。那里是狼窝、是虎穴，是敲骨吸髓的魔窟！蔡洪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民族恨，拳头攥得紧紧的：哼！这些魔鬼欠下我们中国人民的血债总有一天要清算，这些狼窝虎穴总有一天要捣毁掉！

两元“花旗”钞 一顶“黄号”帽

一九四五年秋，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日本鬼子。但国民党“遭殃军”一来，世道一点也没变好，工头们摇身一变，依然在码头上横行霸道，穷人们依然在火坑里受苦受难。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厦门码头工人从各方面听到革命的大好形势，心里暗暗高兴，他们经常互相传播着胜利的消息。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怕工人们起来造反，网罗了一大批特务、狗腿，分别插入什么“家族自治会”、黄色“工会”，还成立了所谓“码头管理会”，来控制各个码头，加强对码头工人的法西斯统治。

这个所谓“码头管理会”在伪市政府的指使下，通过一项决议，把所有的码头工人、民船工人都造了名册，编上号码，分组登记。又由伪社会科制定一种印上工人编号、黄布黑字的黄号帽，强迫码头工人买来戴。这种黄号帽在政治上是对码头工人的迫害和凌辱。反动军警、工头流氓之流，不但对戴着黄号帽的工人可以任意打骂、侮辱，而且如果看到工人们围在一起交谈什么，就认为是“不安分”、“图谋不轨”，就把工人号帽上的号码记下来，查对名册，进行迫害和镇压。在经济上，它是对码头工人的又一项敲榨和剥削，一顶粗布滥制的黄号帽，顶多不过一两毛钱美钞（当时伪币贬值，市场上讲价钱经常以美钞计算），却硬要向工人索取两元美钞。要是不戴黄号帽，就不准在码头上做工。当时多少码头工人，为了一顶小小的黄号帽，吃尽了苦头，蔡洪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蔡洪已经成了家，并且有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来的两元美钞去买黄号帽呢？只得硬着头皮拉起租来的板车到码头上找活干。那一天早上，蔡洪把板车刚拉到自来水公司前面，突然一个伪水上警察当胸一把抓住了他，气势汹汹地问道：

“帽子呢？”

“没有。”

“好！跟我走！”

蔡洪被猛地推了一把，被带到了附近的伪水上警察局二楼。一上楼，一个伪警官听那个伪水警说了一通，就站起来

“啪啪”打了蔡洪两记耳光：

“好大的胆子！为什么不戴黄号帽，想造反吗？”

蔡洪傲然挺立着，心想：我们工人就是要造你们这些反动派的反，别看你现在凶，你们的狗命不长啦！那伪警官见蔡洪不吭声，又威胁蔡洪：

“明天再不戴号帽去拉车，把你送到风屿（当时反动派的监狱所在地）去！”

为了免得再遇到麻烦，蔡洪只得去找穷兄弟们帮助。大家你凑两角，他凑三毛，七八个穷兄弟总算给蔡洪凑足了两元美钞，这才买上了一顶黄号帽。穷兄弟们也是从有一顿没一顿的伙食钱里硬省下来的，蔡洪宁可一家人每顿少喝一碗稀粥，也要每天抽出一毛半角来还钱。两元钱的美钞，一家人勒紧腰带整整还了三个月才还清。

不戴黄号帽不许在码头上做工，戴了黄号帽也时常倒楣遭殃。那些国民党遭殃军，一见带黄号帽的工人，就任意拉伕。一天，蔡洪和几个工人拉着板车，被遭殃军强行抓去，结果替他们整整拉了一天货，临了，车资工钱没拿到半分，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和几个拳头。国民党匪军将要逃窜时，更是到处乱拉戴黄号帽的工人替他们搬运货物去装船。蔡洪就和工人兄弟们一起暗中用损坏货物、磨洋工等方法对付他们。匪兵们又气又急，一会儿骂工人们不小心，一会儿挥起鞭子要打人；工人们不理睬他们那一套，故意埋怨货箱不结实，包扎不好，停下来装装包包，一摆弄就是老半天，急得匪兵们干瞪眼。蔡洪和工人弟兄们心中暗暗高兴，他们知道翻身解

放的日子就要来到了，都在盼望解放大军快来，来得越快越好！

翻身作主人 永远干革命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灿烂的阳光冲破了云层，滚滚的鹭江激起了欢腾的波浪。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厦门岛解放了！到处锣鼓喧天，歌声嘹亮，人民热烈欢迎日夜盼望的亲人解放军。挤在人群中的蔡洪，仰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霎时热泪盈眶，他和人们一起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不久，蔡洪和其他工人一起拿到了红彤彤的工作证，他高兴得一路跑着回家，进门差点和老伴撞个满怀。老两口捧着工作证，满面春风，喜泪滚滚，目光一齐落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上，嘴里不约而同地说：“全托毛主席的福呀！”是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就没有蔡洪一家的今天。蔡洪无限深情地望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一定听您的话，跟您老人家干一辈子革命！”

蔡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解放以来，他二十几年如一日，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事事赶前，处处带头。一九五三年，在支援前线的战斗中，他带领全排同志，夜里冒着敌人的炮火，克服着疲劳、困倦、看不清道路等种种困难，把面粉、大米及其他军需品送到黄厝、五通等地，每晚战斗

到后半夜一两点钟，还经常帮助兄弟排一起完成任务后才回来。第二天清早七点钟，他们又精神抖擞地战斗在码头上。他负责的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被评为先进单位。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排一直保持着“先进排”的光荣称号。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蔡洪在一场协助兄弟队的劳动战斗中负伤了，大家立刻把他送进了医院。住院期间，干部们、工人们纷纷前来探望。要出院的那一天，公司的领导来看他，并且告诉他上级决定让他休养一年。蔡洪一听，忽地热泪如泉水般涌出来。他立刻又回想起在旧社会刚到厦门的第四天，因为扛豆饼砸伤左腿还拿不到工钱，病重没钱医，躺在马路旁差点死掉……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呢！

解放后，蔡洪曾多次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蔡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四年，蔡洪年老光荣退休了。但他人虽退休了，心里却时刻装着码头。退休后，一直担任着码头纠察队的工作。遇到有外轮来或有其它紧急任务，他总是争先恐后地去参加劳动，小伙子们把他拉回家，一转眼他又从家里跑出来投入战斗。他说：“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我还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支援世界革命出力，在家里怎么坐得住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蔡洪被大家推选当上了工人纠察队班长。他带领全班同志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坚决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关系到我们子孙万代不再受苦的大事。我虽然退休了，但这样的大事哪能不管？”他带领纠察队的同志，和一小撮坏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不怕威胁，坚守岗位，日夜巡逻，保护货场。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他更感到自己肩负的阶级责任的重大。他努力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发扬旺盛的革命斗志，意气风发地和大家继续战斗在一起。